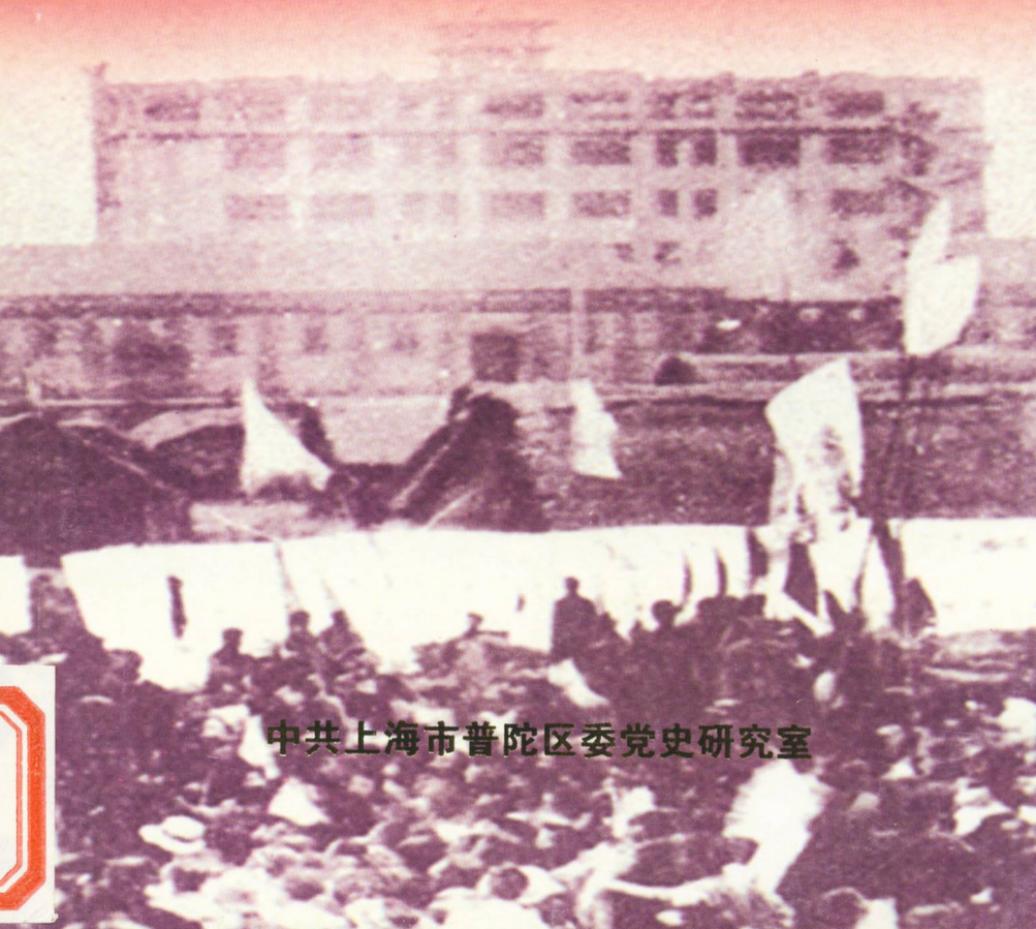


普陀区党史资料丛书 第一辑

孙良惠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

刊号	
顺序号	K-1682
上海市普陀区档案馆	

孙良惠

王尧山题

上海市普陀区党史资料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徐 林

副主任 华校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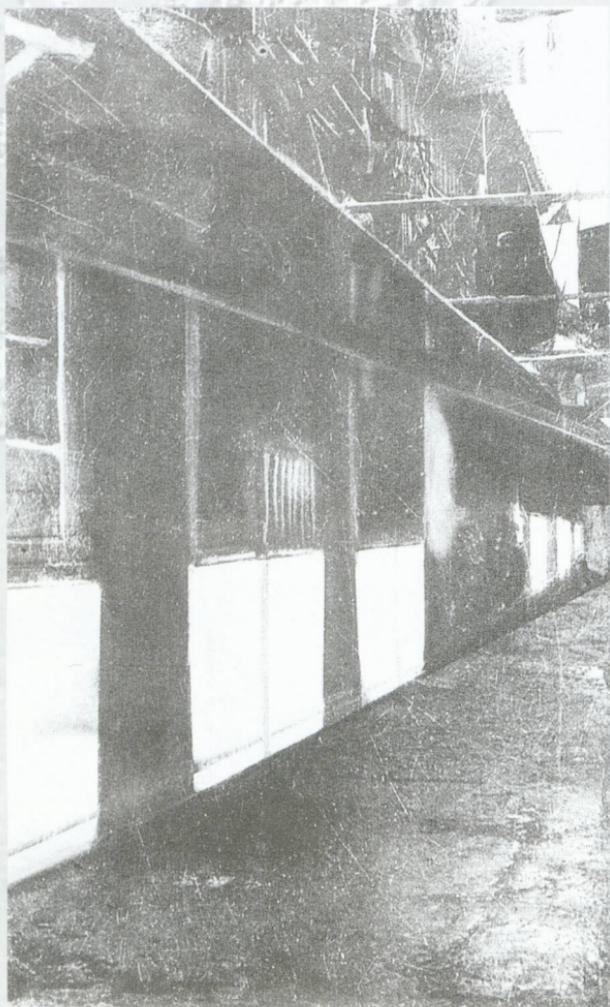
成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华校生 刘景成 李盛祥

张佩华 徐 林 袁彩根

曹 敏

《孙良惠》主编 华校生 刘景成



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沪西小沙渡(纱厂集中区)开办工人半日学校。这是全国第一所由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的工人学校,由李启汉主持,孙良惠在此学习,并协助开展活动。图为该校旧址:安远路锦绣里(今安远路62弄178—180号)。



1924年9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孙良惠为俱乐部主任。图为该部遗址：小沙渡（今西康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拐角处（解放初拍摄）。1987年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列为市级革命纪念地。



孙良惠烈士

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各级党部进行改组。图为 1924 年 5 月 5 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部部分成员合影。图后排左二为毛泽东、左五为孙良惠。



1925年5月24日,内外棉纱厂工会在沪西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孙良惠为大会主席。

序

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 叶维华

普陀区是上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区，以我区西康路和苏州河相交的原小沙渡和曹家渡为中心的沪西是上海早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早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刚建立不久，便派员到我区的小沙渡开办工人学校，通过传播先进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924年在我区小沙渡地区筹建了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工运发祥地长辛店和安源工人俱乐部相媲美的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和我区的团结战斗的堡垒。自此，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1949年上海解放，沪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反抗黑暗势力的斗争从未间断。沪西一次战斗尚未结束，另一次战斗火焰又燃烧起来；一次斗争失败不久，另一次斗争又接踵爆发；一批先行者刚刚倒下去，又一批仁人志士站了出来。在这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老一辈革命活动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孕育了伟大的沪西魂，这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彻底为人民谋解放的无私奉献、团结战斗的严明纪律、自强不息的顽强拼搏精神，形成了我区的光荣革命传统。

《孙良惠》是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党史资料系列丛书之一。

孙良惠是我区的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的工人党员和党组织负责人，在领导我区人民进行1925年的“二月大罢工”、“五卅运动”和1926年至1927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都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1930年在武汉英勇牺牲。他无私无悔地为发展中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英勇奋斗的精神永载史册。

《孙良惠》的资料征集和编纂是在历尽史料库里“大海捞针”的艰辛和千里寻访的磨折中才取得的。可喜的科研成果，为我区又增添一份丰富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孙良惠的一生则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伟大实践者。孙良惠作为我区近代的最早产业工人，以其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在其短暂的峥嵘岁月中以其气势磅礴而又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了他改造社会的光辉业绩。孙良惠原是普通的工人，在当

时先进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熏染下,觉醒成长,并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带领我区人民从思想上精神上和行动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引导一批革命志士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在我区演绎了一幕又一幕的革命史诗剧。孙良惠走上革命的征途后,便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地战斗,直至最终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孙良惠》一书为我们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我区的党史,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从中我们可以学习我区革命先辈的光辉思想,得到前进的动力。现在我们要以孙良惠烈士为榜样,坚持从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在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加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建设日益繁荣昌盛的新普陀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目 录

序 叶维华

孙良惠传 华校生 刘景成(1)

历史文献

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 (21)

中共沪西区的早期组织 (27)

上海总工会代表孙良惠先生演讲 (30)

纪念二七并悼刘华 孙良惠(34)

孙良惠关于陶静轩烈士遇难及善后料理经过的报告 ...
..... (37)

陶静轩烈士生平 孙良惠(40)

中共武汉市委通知(第5号) (42)

周恩来同志复嵇直信 (45)

回忆与怀念

关于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经过的回忆
..... 嵇直(47)

关于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刘贯之(58)
我和沪西工友俱乐部	顾汝舫(63)
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姜维新(64)
沪西工友俱乐部	张铨(66)
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	姜维新(79)
回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及其他(节录)	姜维新(91)
孙良惠革命活动史迹寻访记	华校生 刘景成(94)

附 录

《警务日报》有关孙良惠活动足迹的记载摘选	(105)
后记	(123)

孙良惠传

华校生 刘景成

孙良惠，化名张忍斋，南京人，满族，生于 1898 年，自幼随家人来沪，进日商同兴纱厂做工。1920 年，在工人半日学校学习，1921 年任沪西纺织工会负责人，1923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4 年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同年 9 月任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1925 年 1 月，任中共沪西支部负责人；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历任全总一届执委，二、三届候补执委，全总上海办事处宣传部长，上总执委和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1927 年 6 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去汉口，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1930 年 10 月，在武汉被捕牺牲，时年 32 岁。

砸碎被锁之链 脱颖而出

20 世纪初，中国濒临灭亡的边缘，国家衰微，经济停滞，战乱连年，人民涂炭，许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流向上海，寻求出路。祖籍在南京的孙良惠一家亦随着

人流到上海的沪西谋生。沪西境内的吴淞江南岸部分地区在 1899 年被帝国主义列强划为公共租界，外商凭借特权开设了许多工厂。孙良惠在日人开的同兴纱厂做工，每天劳动 12 小时，整年累月拼命干活，凭着一点微薄工资，维持全家饥寒交迫的生活。在政治上，受东洋老板的欺凌，没有人身自由；在劳动中，没有生命安全的保障。孙良惠和许多工人一样，在苦水中挣扎。

孙良惠所在的工厂是近代大工业的企业，工人们经过高度集中的劳动生产，养成中国工人阶级大生产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的高贵品质，他们经常在自发地进行着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罢工斗争。20 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小组建立不久，便决定派小组成员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开办工人学校，通过传播先进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创造条件。1920 年秋，在槟榔路锦绣里（今安远路 62 弄 178、179、180 号）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后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正在同兴纱厂做工的孙良惠闻讯后积极报名进校读书，学文化、听演讲，接受革命真理的教育，很快提高了政治觉悟，使他认识到只有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单靠个人反抗是没有出路的。此后，在李启汉的帮助下，1921 年孙良惠组织了沪西纺织工会，积极参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活动。这年五一

节那天，租界和华界当局针对工人要集会活动，在各重点地段有大批巡捕和军警布岗，纪念筹备办事处也受到监视，集会游行计划受阻。但是，孙良惠和李启汉不畏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坚持在当天下午带领一批工人沿西苏州路至宜昌路，然后过苏州河，冲破阻力，散发许多传单。不久，孙良惠代表沪西纺织工会，参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工界外交大会，与会者表明了维护我国领土完整和完全独立的严正爱国立场。租界当局视李启汉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上海工人游艺会）为眼中钉，于1922年春派巡捕封闭学校，李启汉不久亦被捕，孙良惠也被日商开除出厂。孙因生活困难所逼，后来找到一家银行当门警。李启汉自从被捕后，他们的联系中断了。孙良惠积极打听寻找李启汉的去向，终于在这年秋天，听说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一家木行楼上有一个工人补习班，老师讲的道理和李启汉所讲的差不多，孙良惠喜出望外地前往打听李启汉下落。这个工人补习班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派嵇直来沪西继李启汉之后开办的。嵇直一听来访者是问李启汉下落，心存孤疑，李启汉已被捕，这个“警察”还找他干什么？孙良惠见校方对他有戒备，便自我介绍说，“我叫孙良惠，原是日商同兴纱厂工人，曾在李启汉创办的工人半日学校读过书，后被开除，现在一家银行当门警。”嵇直听了，非常高兴，暗暗称赞“启汉呀！你在小沙渡这块工人运动处女地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茁壮

成长了。”^①以后，孙良惠经常到补习班听课，在上课讨论时，他总是带头发言，用自己的体会和工人的语言，协助老师给同学们解答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于1923年11月，由嵇直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他成了沪西地区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人党员。

初战功表青史 工人先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3月正式成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施存统、邓中夏等在执行部任职工作，不久，孙良惠作为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的身份也参加执行部工作，加入的还有李立三、杨之华、张佐臣、刘重民等共产党人。他们以国民党的名义采取公开募款、宣传、慰问、集会等方式，直接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这年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声援工人罢工等都是在执行部名义下积极开展的。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孙良惠等15人被推选为委员。同年末，执行部中的中共党员孙良惠、恽代英、向警予、宣中华、俞秀松等，和许多国民党人士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12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召

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俞秀松等起草的成立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孙良惠等 21 人被选为促成会委员。

孙良惠革命工作和战斗的重心在沪西。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在工人区普遍开办平民学校，邓中夏以上海大学为阵地，重点深入沪西地区，并在共产党员孙良惠的积极协助下，嵇直和徐玮在两个补习班的基础上创办了“沪西工人补习学校”，以扩大党在沪西工运中的影响。经孙良惠多方串联，来上学的工人逐渐增多，内外棉五厂戴器吉就是经孙良惠劝说来上学的。有一天，戴器吉约了一些同乡小兄弟在补习学校门口打拳练武，孙良惠做戴器吉等一批青年思想工作说，“你们到学校里来读书吧，我们工人光练武不行，要文武双全，才能斗得过那帮坏蛋。”戴器吉一听这话有理，就报名上学了。那时学校里经常讲课的是嵇直和徐玮，孙良惠担任辅导工作，有时也请中央委员邓中夏来讲课。有一次，孙良惠听戴器吉讲，他走在路上向一个拆字先生问字，那家伙眼珠一弹，说什么穷工人一辈子别想出头，工字一出头就要入土（就是要死），读书有什么用……孙良惠就请了邓中夏来辅导。邓中夏一边笑，一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工”字。他解释说，这个工字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这就是我们工人的伟大形象。剥削阶级故意编造一些鬼话，来糟蹋我们工人，其实他们离开了做

工的、种地的，一天也活不去。他接着说，我们工人阶级来到人间，就是给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挖掘坟墓，别看他们今天耀武扬威，到明天千千万万工人、农民觉悟了，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他们的寿命就不长了，真正“入土”了。邓中夏的一番话，说得工人个个精神振奋。他们在补习学校里，不仅学到了文化，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觉悟，这时戴器吉和内外棉十五厂的陶静轩、同兴纱厂的盛松林等，也分别加入党和团的组织。就这样，党在沪西工人中的根子越扎越深。

1924年夏，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参照长辛店和安源工人俱乐部经验，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以加强对沪西工人运动的领导。当时孙良惠和嵇直、徐玮、陶静轩、戴器吉、刘贯之等在工人中积极进行宣传，鼓动工人参加俱乐部。大家表示拥护，并积极进行筹备。补习学校的房子太小，容纳不下很多工人活动，这时孙良惠自告奋勇，多方设想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拐角上租了新建的平房三间，二间做教室，一间做文娱室，门前空地做武术活动的场地。所需的桌凳和文具用品等，都是孙良惠和几个热心的工人从亲友、邻居那里借来的，或从自己家里拿来的。一切布置就绪，就在9月1日举行俱乐部成立大会。这天到会的有30多人。会议由孙良惠主持，项英讲了话，与会者发了言。会上一致通过了俱乐部章程，

并公推孙良惠为主任，嵇直为秘书，徐玮和刘贯之等为干事。项英根据俱乐部的宗旨，在红纸上挥笔写了16个大字“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端端正正地贴在俱乐部的中堂上。会上，还进行了募捐，作为俱乐部的活动经费，戴器吉等把口袋里的全部家当——几个角子和铜板统统倒在嵇直的草帽里，虽然捐款数目不多，但表明了大家对俱乐部的一片热忱。

俱乐部成立不久，嵇直调往外地，上级党组织派刘华任俱乐部秘书，和孙良惠一起负责办好俱乐部。在俱乐部教书和演讲的主要有上海大学师生，此外还有邓中夏、刘华、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李立三、项英、杨开慧等共产党人。孙良惠等同志在宣传教育方面，抓住工人中受资本家虐待的共同感受教他们唱一首《青工歌》（苏武牧羊调），并很快在俱乐部流传：

“青年身体未长成，
工资一二角，做工十二点，
做夜工、礼拜工，一刻不休停。
白相都没有，读书没铜钿，
打骂又罚工，开除由他便，
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一概不自由！
兄弟姐妹们，睁眼望望清，
资本家不做工，专门剥削人，
拿我们当牛马，做工养他们。

青年工友们，我们要翻身。

齐心协力，打倒他们，世界属我们。”②

工友们在俱乐部受到教育，他们回到各自的工厂、车间，又把这些道理进行宣传，教育其他工人，收到很好的效果。沪西工友俱乐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人，沪西工人在一天天觉醒。

在组织工作方面，按照《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规定，孙良惠在工人中深入细致的工作，积极分子的队伍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年底，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孙良惠就在同兴纱厂建立起几个俱乐部小组，加入俱乐部的有 300 多人，在整个沪西地区就有 19 家纱厂建立俱乐部的秘密组织，部员已发展近千人。这在上海工运史上是个跃进。

点燃罢工烽火 功垂沪西

党在沪西工人中辛勤播下的种子，经历了生根发芽的阶段，已经欣欣向荣地成长起来。1924 年 9 月，沪西工友俱乐部里成立了中共小沙渡党小组，有 8 名党员，其中 5 名为工人党员。到了 1925 年 1 月，又在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沪西支部，有 32 名党员，负责人为孙良惠。③沪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加强了对沪西工人运动的领导，取得了沪西工人的信任和拥护。同时，工人们对本日本资本

家残酷剥削和非人的虐待，忿恨日积月累，已达到再也不能容忍的程度。工人工资低，工时长，日工早上六点进厂，晚上六点出厂，夜工晚上六点进厂，早六点出厂，一天要做工12小时。就在这年2月2日清晨，内外棉八厂还没有放工，工人从昨晚五点半进厂已经连续做了11个多小时，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又饿又困。粗纱间一个十二岁的瘦小童工，实在支持不住，靠在车头上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来，这时，吃饱睡足的日本领班突然间进车间巡查，一眼看到打瞌睡的小姑娘，奔上前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小姑娘的血从裤脚流出，倒在地上不住的呻吟。正在车间做工的小姑娘的姐姐看到妹妹挨打，急忙跑上前去与日本领班评理。蛮横无理的日本领班却骂她多管闲事，还恶恨恨地打了她两个耳光。愤怒至极的男工们纷纷上前，大声指责日本领班。日本厂主不但不承认日本领班殴打童工的错误，反而决定将粗纱间夜班的50名男工全部开除。日本资本家毒打女工并且大批开除男工的消息一经传开，工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跑到俱乐部，要求俱乐部为工人撑腰，发动“大摇班”（大罢工）。工人反抗斗争的决心和对俱乐部的信赖，表明沪西工人在党的教育下已经觉醒。孙良惠立即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请求上级支持领导工人罢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当即开会研究决定，派邓中夏、李立三到沪西，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作了反抗斗争的具体部署。孙良惠亲自领导和发动沪西支部党员和

工人群众，把自发的罢工转为有组织、有领导的罢工斗争。罢工前，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召开各厂都有人参加的会议，俱乐部的三间平房座无虚席，邓中夏等党的领导人出席会议，作了大罢工的战斗动员，成立以李立三为首的罢工委员会，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会后，孙良惠按照会议的要求，与刘华商定，以沪西工友俱乐部名义，印发了号召工人罢工的传单。④传单内容有：一、以后不准打人；二、工资增加两成；三、恢复被开除之工人；四、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五、罢工期内的工钱照常发给；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传单最后说，“工友们，大家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对日本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传单对唤起工人阶级对日本资本家压迫剥削的仇恨，对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起了很好的作用。俱乐部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和镇压，已在1925年初从租界区搬到浜北，这时潭子湾三德里成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新的战斗指挥部。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下，沪西内外棉11家纺织厂，1.7万余工人先后参加了大罢工，沪东工人也起来参加大罢工行列，至此，日商6个纺织会社、22家纺织厂，3.5万余工人投入了震撼上海滩的二月大罢工。这时候的孙良惠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为了让浜南的工人参加2月19日在潭子湾召开的群众大会，他亲自找了3条船搭成浮桥，让工人过河参加大会。不料，大批警察向会场冲来，当场逮捕了20多人。孙良惠

挺身而出，和邓中夏一起，带领七、八名工人代表去警察局交涉，结果全被扣押。敌人的镇压激起了工人更大的罢工风潮。罢工对日本资本家打击是沉重的，单是内外棉各厂直接的经济损失达50万日元。日本厂主害怕了，被迫坐下来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日商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警察局当局亦被迫释放邓中夏、孙良惠等被捕人员。这次历时近一个月的罢工，灭了日本资本家的威风，长了中国工人的志气，打响了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的前哨战。

五卅浴血奋战 工运领袖

1925年5月，孙良惠代表上海工人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刘少奇等主席团成员一起署名发给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通电，正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孙良惠在这次大会上以上海代表团的名义发言，并被推选为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委。会议刚结束，孙良惠就立即返回战斗中的沪西。这天是15日，刚刚发生顾正红惨案。孙良惠马不停蹄，第二天一大早就召开会议，具体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地委的两条决定：一是把顾正红被害真相公诸于众，以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为扩大影响，争取各界支持，孙良惠派人到各学校、各团体散发传单，广泛宣传；二是隆重追悼顾正红烈士。经协商于5月24日下午在潭

子湾广场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孙良惠为大会主席。24日那天，一万多人赶到潭子湾参加追悼会。孙良惠宣读祭文后，率领大家向顾正红烈士遗像三鞠躬。会场上，“为顾正红报仇！”“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惊天动地。公祭完毕后，共分五处讲台，由各学校、各团体代表举行演讲。烈士的鲜血唤起人民的觉醒，烈士的追悼会，成为动员各界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誓师大会。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斗争在上海酝酿着。5月30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在南京路上，上午，学生演讲队散发传单，演讲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和顾正红遭枪杀，不少学生因援助工人而被捕。下午，内外棉罢工工人、邮局工人、铁路工人、手工业工人、店职员、中、小学教员纷纷加入学生的演讲队，反帝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帝国主义强盗便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开枪屠杀，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连夜开会，决定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以领导全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即秘书长），孙良惠任总务副主任。

上总成立后的第一道命令是宣布全市总同盟罢工。6月1日，霹雳一声，全上海实现了罢工、罢课、罢市。为加强对全市人民“三罢”斗争的领导，上总按中共中央指示发起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指挥“三罢”的公开机关。孙良惠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当上海工贼工会“上海工

团联合会”的头子王光辉妄图挤进工商学联合会并排斥上海总工会时，孙良惠挺身而出，亲率 300 多人赶到正在开会的公共体育场，在群众大会上，揭露王光辉的工贼面目，正式宣告成立由上海总工会等 25 个团体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统一战线组织，通过该会领导上海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将反帝怒涛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孙良惠加紧在潭子湾召开会议，讲述了帝国主义在南京路屠杀中国人民和全市已经开始“三罢”的情况，并传达党对工会的要求。这天，苏州河北边的滨北一带罢工已发动起来，路上人来人往，呈现了大罢工的战斗高潮，但滨南租界区却因消息被封锁，显得冷冷清清。这时，孙良惠与刘华商量决定，派人过河散发传单。站在一旁的詹仲炳和几个纠察队员请战心切，都争着去。经研究决定，由詹仲炳等人过河去执行任务。他们巧妙过河，发动罢工，仅仅几天内，滨南几乎所有外国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了，在日本商人家里被雇佣的中国厨师和奶妈，也纷纷辞职不干。日本人买不到食物，不得不依靠军舰运送，连出门走路也提心吊胆，平时那种嚣张不可一世的气焰被打了下去，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极端恐慌和仇恨，他们收买地痞流氓寻衅，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9 月 18 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孙良惠和李立三、刘少奇等被列入通缉的黑名

单,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孙良惠早已被敌人列入重点监控对象,但他毫不畏惧地继续日日夜夜秘密活动在沪西潭子湾一带工人群众之中。有一次,孙良惠在小沙渡集合三、四百名纱厂工人开会,拟恢复上总第四办事处,立遭军警驱散。敌人的《警务日报》经常刊登孙良惠的活动情况,密报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就在他极其困难和最危险的时候,中央决定,派孙良惠到广州,向有20万人参加大罢工的省港工人作五卅惨案情况的演讲。他代表上海总工会、代表上海21万工友愤怒揭露日、英帝国主义惨杀中国人民的罪行,表达了上海工友的严正决心:“上海总工会虽然被封,总工会的精神还在,并且正在秘密组织起来,做更坚决的斗争。”孙良惠的这篇演讲,刊登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创办的工人报纸《工人之路》特号上,分两次连载,影响深广,给省港大罢工以有力的支持。

就在这年底,上海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孙良惠的亲密战友、上海工运领袖刘华惨遭杀害。孙良惠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他当即在《工人之路》上发表了悼念刘华的文章,揭露敌人、歌颂刘华,表示要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大在广州召开,孙良惠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出席大会,并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第二届候补执委。回上海后,被任命为码头总工会委员长,

他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工人武装起义 一马当先

1926年到1927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孙良惠始终冲杀在斗争的前列。

在第一次起义时，孙良惠已被任命为浦东码头总工会委员长，陶静轩为副委员长。浦东码头情况复杂，在那里有“二十股党”、“三十六股党”等各种势力。孙良惠和陶静轩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巩固和发展了码头工会，组织了13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并拥有十余支枪，是浦东起义的一支主要力量。不幸的是，由于泄密，原定起义的当晚，浦东的警察已得知消息，彻夜巡逻搜查，破获吴家厅起义指挥部，陶静轩等被捕牺牲。孙良惠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向中共上海区委写了“关于陶静轩烈士遇难及善后料理经过的报告”，并亲撰“陶静轩烈士生平”。他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又怀着激愤的心情，投入了积极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战斗。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各项准备工作没有完全落实，中共中央在1927年2月23日决定停止暴动，并作出“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暴动”。3月5日中共中央特委会上，孙良惠被任命为浦东总指挥之一，日日夜夜在浦东奔波，调查敌情。3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孙良惠在浦东的一个秘密据点，

传达了上级关于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具体部署,兵分三路:第一路封锁江口,防止敌人乘船逃跑;第二路经花园石桥,从后面包围第三区警署;第三路从正面进攻。浦东的作战方案刚布置就绪,孙良惠就奉命急调南市任副总指挥,亲自率领工纠队员打冲锋。据与孙良惠一起战斗的姜维新回忆,“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我在南市区租一间房子,负责放火作为信号。起义那天,中午12点,我按规定放了火,接着,区的副总指挥孙良惠叫我到前面去看看。我朝前走到警察所,朝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孙和我便冲进了警察所,大家也都冲进去缴了警察的枪。后来我们又去小南门集中,并将机枪放在汽车顶上,去攻打制造局(现江南造船厂)。制造局里驻扎着一营军队,当我们冲进去时,敌乘船逃跑,中途翻船,淹死了不少人。我们攻占了制造局后,又拿下了水上派出所。这样,南市很快全拿下来了,大家情绪十分高涨。下午四时,南市的战斗胜利结束”。^⑤当晚,孙良惠就回浦东参加了5万人的群众大会,大会庄严宣告,浦东地区各业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这是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所建立的第一个区的民众政权,孙良惠当选为执行委员。

3月27日上海召开了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孙良惠被选为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上海地方运输总工会委员长。他立即赶赴浦东,在烂泥渡主持召开了100多人参加的各码头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宣

布上总决定：将码头总工会改为上海地方运输工会以及下属七个分会的名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群众惨遭镇压，孙良惠不幸被捕。同年6月，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上孙良惠仍被选为全总后补执委。

临危受命赴汉 光荣捐躯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或枪杀。孙良惠在白色恐怖中，以“嫌疑犯”的身份被判十年徒刑。党组织为其家属补助30元以作慰问，同时积极设法营救。后来孙良惠获释，在1930年他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到白色恐怖下的武汉继续战斗。1930年6至9月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李立三起草并被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指导下，各级党、团、工会合并，停止正常活动，成立行委，成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指挥机关。武汉是李立三计划中的重点，他调动各路红军时，高唱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而当时武汉党组织力量薄弱，仅有党员200多人，赤色工会会员150多人。长江局总行委在组织武汉暴动时，困难重重，于同年8月20日，中共长江局向中央报告，“请求中央在上海派一最好干部来此，参加主席团，负工会责

任。”⑥同年8月19日和26日，分别从共产国际莫斯科返回上海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开始为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而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8月26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说，同意派干部去武汉，湖北省总工会要加强，现在上海要抽些人派去，至少还可派四、五人。⑦而出狱不久的孙良惠便临危受命奔赴武汉，开始新的战斗历程。孙良惠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立即开始工作。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武汉实行空前的白色恐怖统治。军警密布，密探遍市。除警备司令部外，还有宪兵团、教导团，游击大队及武昌、汉口、水上公安局都加入了镇压的行列。从8月起，执行蒋介石秘字第11号密令：凡属共产党案件，不再经法院审判，直接由武汉警备司令办理。许多革命同志刚一被捕即被杀害。9月16日汉口区行委主席团委员宋惠和被捕后叛变，公开带领敌人捕人，致使刚上任不久的孙良惠被捕。孙良惠被宪兵团逮捕后，由于是刚从外地而来，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化名张忍斋，自称湖北咸宁人，年龄32岁，职业为经商。但不久在叛徒的指认下被出卖了，他的省总主席委员身份被写在敌档案卷中，10月28日被判死刑。1930年11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通知（第5号）中，向各级党组织通告“最近两个月，因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士有郭士杰、吴芳、陈了君、孙良惠……和其他革命领袖、革命群众计不下百余人……”。⑧孙良惠从被捕到牺牲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英勇

的斗争精神。他受尽了敌人一切严刑拷打，始终没有透露党的任何机密。在监狱中，没有放弃其煽动者和组织者的使命，宣传和鼓动难友继续斗争，在临刑的前一刻，慷慨高呼，英勇就义。

周恩来高度评价孙良惠的丰功伟绩，1941年在重庆复函嵇直时称赞孙良惠“是一个很好的同志。”^⑨

孙良惠的英名永远镌刻在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丰碑上。

注：

①嵇直：“关于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经过的回忆”，载：《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281页。

②姜沛南：“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二辑。

③《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普陀区组织史资料》第一章第一节。

④《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302页。

⑤《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二辑。

⑥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中共长江局关于目前武汉形势与工作状况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20日）。

⑦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中共中央文件摘抄（1930年8月26日）。

⑧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1930年11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通知(第5号)。

⑨周恩来同志复嵇直信,本件由嵇钧生提供,现原件存于中央档案馆。



历史文献

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①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本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②，故定名为沪西工友俱乐部。

第二条 本部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为宗旨。

第二章 部员

第三条 凡属沪西工人^③，不分男女，愿遵守本部章程者，均得为本部普通部员。但须一人以上之介绍，填写(志)愿书，方得为正式部员。

第四条 部员之权利

(一)有享本部举办各事之利益。

(二)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三)有发言权及表决权。

(四)有提议权及弹劾权。

第五条 部员之义务：

(一)遵守本部规约。

(二)纳入部费和常月费。

(三)服务本部一切职务。

第六条 凡热心赞助本部者，由委员会认可，得请为本部特别部员。

第三章 组织

第七条 每厂有部员三人至十人者，即组织某厂基本小组，公推组长一人，有三小组以上者，即组织某厂支部④，公推书记一人。其细则另订之。

第八条 全体组长会议，为本部最高立法机关。审议本部预算决算及一切重大进行事件，选举执行委员。

第九条 执行委员会由全体组长会选举九人组织之，总揽一切部务，为本部最高执行机关。其职权如下：

- (一)执行大会议决事件。
- (二)决定预算案。
- (三)决定大会未决定的一切事件。
- (四)征收会费。
- (五)解决部员纠纷。

第十条 执行委员会之职务分配如下：

委员长一人，总管本部一切事宜；

秘书委员一人，掌管本部一切文书事宜；

会计委员二人，分管本部银钱帐事宜；

庶务委员二人，分管本部购买及保管各物件事宜；

教育委员一人，掌管本部教育事宜；

交际委员二人，掌管本部交际事宜；

游艺委员一人，掌管本部一切游艺事宜。

第十一条 执行委员任期六个月，组长及本部⑤书记任期三个月，均连选得连任。

第十二条 委员会得酌量情形，得指派部员为各股干事，襄助各股事务⑥。

第四章 会议

第十三条 全体大会，每一年一次，由委员会定期召集之。组长会议及支部书记会议，每月一次，由委员会召集之。有特别事故时，得由三分之一组长请求，或委员会认为必要时⑦，由委员会召集临时会。

第十四条 小组会议每两星期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支部全体会议每一月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

第十五条 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委员长召集之。遇特别事务时，得开临时会议。

第五章 规约

第十六条 本部部员必须遵守之规约如下：

- (一)不得违反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
- (二)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位等项。
- (三)不得顾及个人私利，违反公共利益。

(四)不得有破坏本部和有碍部员之言动[行]。

(五)不得迟缴或不缴月费。

(六)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⑧。

第十七条 凡部员有犯以上之规约者，经委员会审查，认为属实者，得令其出部。

第六章 部务

第十八条 本部部务计分八种，(依需要之缓急，及能力之所及，其次第举办。)由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部员，组织各个委员会办理之。

(一)补习学校，(二)讲演会，(三)合作社，(四)书报室，(五)各种游艺会，(六)储蓄会，(七)部员救济会，(八)职业介绍所。

第七章 经费

第十九条 本部经费计分下列三项：

(一)入部费：每人小洋一毛。

(二)常月费：以部员工资为比例，十元以内铜元十枚，十五元以内小洋一毛，二十元以内小洋二毛。

(三)特别捐⑨：由部员及外界捐助之。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如有未尽善之处，得由全体组长

会议三分之一提议，五分之三通过修改之。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本部正式成立日起施行。

注：

①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就编者所见有两种版本：一是本书里选用的《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另一是《沪西工友俱乐部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系《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据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一书译出。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前者系中文本；后者是由中文译成日文再译为中文。本资料选用前者。对其中有些条文出入较大的，依《规则》的译文加注。

②《规则》为“本部由沪西职工组织之”（着重点为编者所加）。

③《规则》为“沪西职工”。

④《规则》为：“各工场若有部员三人及至十人时，或其工场中基本小组在三个以上时，皆得组织工场支部”。

⑤《规则》为“支部”。

⑥《规则》为：“委员会得酌量情况，派遣部员指挥各支部之干事，赞助各支部之事务。”

⑦《规则》为：“如有特别之事故，经三分（之）一组长之请求，委员会认为必要时。”

⑧《规则》为：“不得有相互间之斗争或越轨之行动。”

⑨《规则》为：“特别义捐”。

(选自《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

中共沪西区的早期组织

(1924. 9—1925. 9)

党的组织

在沪西建党史上,沪西工友俱乐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沪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小沙渡小组),就是从这个俱乐部工作基础上诞生的。1924年9月,中共上海地委把最早发展的一批工人党员组成4个党小组。小沙渡小组为其中之一。有8名党员,其中5名为工人,中共小沙渡小组成为沪西工友俱乐部领导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

1925年初,上海地委根据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中的“三个党员以上可成立支部”的规定,对所辖的下级党组织在原来小组的基础上组建支部,1月便成立了中共沪西支部。支部成立后发挥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和组织群众,领导了震动中外的二月罢工斗争。

1925年5月15日在内外棉七厂发生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事件,引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卅”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实行“三罢”斗争中,沪西的工人首先投入了这场斗争,参加罢工的有

65000 余人,党和工会的威信在工人中迅速提高,入党的工人和党的组织成倍地增加。同年 8 月,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决定把沪西地区众多的支部,组成小沙渡和曹家渡两个支部联合干事会(简称支联会)。

一、中共小沙渡小组(1924. 9—1925. 1)

(其成员和组长名录待查)

二、中共沪西支部(1925. 1—1925. 8)

支部成员:

孙良惠	黄原昆	陶静轩	夏福生	李瑞清
马彦波	王定玉	邓中夏	蔡支华	胡先清
刘剑华	江源清	顾修	余小峰	刘月柱(桂)
徐晋珊	孔燕南(女)		郭尘侠	王瑞安
关明轩	盛松林	文巧云(女)		刘贯之
朱国平	李金生	姜维新	郭干贞	李剑如
曹正甫	孙杰三	郑永寿	李天涯	

(共 32 人)

负责人:孙良惠(满族)

三、中共小沙渡支部联合干事会(1925. 8—1925. 9)

书记:郭景仁

(成员和基层组织待查)

四、中共曹家渡支部联合干事会(1925. 8—1925. 9)

书记:蔡支华(1925. 8)

陈竹山(1925.9)

(成员和基层组织待查)

(摘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普陀区组织史资料》)

上海总工会代表孙良惠先生演讲

各位工友：兄弟代表上海总工会，代表上海 21 万工友来报告上海此次罢工受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压迫情形，上海工友也很想知道广东省港罢工工友的情形，所以派兄弟来广东一面报上海情形，同时也来看看广东情形。“五卅”惨案，中国人几乎个个都知道了，至于“五卅”发生的原因各报虽有登，但语焉不详，兄弟今日先将当日原因报告一下。“五卅”惨案是因打死顾正红而起，为什么原因打死顾正红？在四月间日本纱厂工友罢工，结果得到了相当的胜利，至五月初因纱价低落日资本家不履行条约，并且开除工友一人，工人便派代表提出质问，日本厂主不但不答应，且收买无赖地痞殴打工人，致打得头破血流，於是内外棉十一厂中有三厂罢工，其他布厂也因为没有纱自己罢起工来，但工人不肯罢工，日本厂主即用电话召巡捕到来工人也不怕，举出代表，说明我们没有罢工，厂主无故要赶我们，一巡捕听见即与厂主交涉，发给工钱，是晚夜工来上工，厂主又拒绝，工人要进去，日本厂主拔出手枪轰击，打死一人，即顾正红，伤十余人，死尸即抬往捕房，伤者送入医院，工会方面听见这个消息，便派人去到医院慰问，并派人去领取尸首，但代表竟被扣留，工人更

为鼓噪，再派代表至巡捕房质问又被扣留，工人益愤，不但工人激愤，在附近学生如文治大厦两大学生亦为愤怒，以为日本资本家已经打死中国工人，中国政府不提出抗议，而反把工人代表扣留，这是什么一回事。到了后来，顾君之父领回尸首，开一追悼会，学生也很多参加，中途为英捕禁止，并捉去学生多人，市民更为愤激，以为日本资本家打死了中国人，扣留工人代表，现在又不许人开追悼会，这而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学生会工会通过都召集会议，讨论办法，后来一致决议于五月卅日，举行巡行演讲，派传单，到了那日学生到各马路演讲，举动极为文明，而巡捕竟随便拿人，但学生会已决议，如各巡捕拿人，则全体学生都到捕房去，因此，学生围住捕房，巡捕便开枪扫射，当场打死四人，伤数十人，市人更愤，一致赞成，次日继续演说，四周散发传单，巡捕又来拿人，拿了一个，又拿一个，竟致巡捕房不能容纳了。只好放出来，放了出来又去演讲，又被捉去，及后开枪扫射，打死很多人，当时大家举出代表质问，领事说租界巡捕可以捕中国人，不能捉日本人，大家想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中国人，被日英打死了，血满马路，代表也被捕入狱，而打死人的反逍遥自在，这就是受不平等条约所赐，大家都知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用处，所以组织总工会，率二十一万与他们奋斗！

现在再讲总工会被封情形，上海在奉系军阀压迫之下，当然危机四伏，不过当时罢工初起民气正盛，不敢下

其毒手，而视总工会为眼中钉。这是不在话下了，他们在天津在青岛，都是压迫爱国运动，解散工会，枪决工人，在上海当然也用同一手段，不过还有其他几个原因。第一为英国帝国主义者，他们尽力摧残，当时已有罢工工人十二万余人，因全国人民都有单独对英的表示，所以他们截断电线，使中国工厂不能罢工，罢工工人增加五六万人，粮食发生恐慌，使工人自己冲突起来，他们便可借口工人骚扰，加以干涉，并且看见日厂工人已上工，他们更怀妒心，于是急急利用军阀把总工会封闭，工人便可无条件上工，这英人的阴谋。第二日本厂主，虽然开工了，为了要反悔，不履行条约，必先将总工会摧残，不然，工友后边有人帮助，不履行条约是会遭人反对，所以也急急指使他的走狗，封闭总工会，这是日本的阴谋。第三是段卖国贼，他是帝国主义的老狗，大家都知道了，这次他想开个关税会，得一笔款子，便想种种法子，买帝国主义的欢心，但是关税会议为全国人所反对，而上海总工会又是反对最力的一份子，所以他要將上海总工会封闭，来讨好帝国主义。还有一班工贼，他们为资本家所利用，初则捣乱总工会，但没有打伤重要职员，反使工人格外团结起来，最后便勾军阀来封总工会了。

总工会在此四面受敌之时，适江浙战争将起，恐工人反对，便把总工会封闭了，他的理由是說总工会侵吞公款，宣传共产，这都是他们的烂言，然而总工会虽被封闭，

总工会的精神还存在,并且秘密组织起来,比较以前格外坚固。

十六十七浙军到上海,我们召集很大的会,到者有三万多人,一致赞成启封总工会,当时为什么可以开会呢?孙传芳允许我们吗?不是的。不过是狗咬狗,没有机会咬人就是了,他允许总工会启封,因军阀与军阀战争,不暇理这事,如果战争完结,一定加以压迫,孙传芳吴佩孚的部下,我们知道,吴佩孚是“二七”京沪惨杀的一位凶手,只有我们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才能解放自己,军阀打军阀于我是没有利益的。最后我们高呼: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原载 1925 年 11 月《工人之路》(特号)133、134 期)

纪念二七并悼刘华

孙良惠

今天是后三年这一天，直系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奉帝国主义的命令，无理惨杀为全中国人民争自由，为工人阶级争幸福的数十先烈就义的日子，这一天是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尤其是我们工人阶级，在这一天表一种哀痛悲悼，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们哀痛悲悼之余：并想起我们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同志的惨死！

呜呼！刘华同志被万恶军阀惨杀，岂但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损失，实全中国民族革命的损失，是全世界十二万五千万被压迫民族损失刘华君的牺牲人格，他的公正廉洁的精神，都使我们哀悼的。他能牺牲他自己一切利益，为工人阶级致死。他在上海中华书局，曾做了二年工。他自己曾为工人创办一个贫民学校使一般失学的工友，都得到机会读书，他将作工余下的工钱，都帮助这个学校费用；他工作之余，就担任这校功课，同时他又担任沪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的义务教员。他自己的衣食住是非常之刻苦的。他的学问知识，真不愧做工人的模范，所以上海二十万工人对他没一个不是十分信仰的。去年二月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他舍身帮助纱厂工人，不要钱不

怕死，不辞劳苦，忍饥受饿，雨里雪里，以身作则，指挥数万工人群众，与日本资本家奋斗，此役所有罢工中坚份子，都被租界帝国主义及卖国的中国官厅捕去，凡九十余人，都关在牢中。刘华同志在此时间还是不畏缩不退避，仍就拼命领导数万工人群众坚持十八日之久，卒获胜利。所以日资本家视刘华为眼中钉，曾买出许多走狗暗杀他，刘华不但不怕，反更加为纱厂工人组织工会，日资本家无时无刻不想拔去这个眼中钉，破坏工会组织，但反使工人团结格外坚固。去年四月纱价停顿，日资本家视为破坏工会的好机会，开除工人无数，皆是罢工时之代表。工人与之反抗，日资本家使用最残暴手段，开枪打死内外棉工友顾正红，遂激起五卅事变。五卅惨杀后，刘华即被举为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在社会奔走呼号，在工人群众指出帝国主义阴谋残暴，种种事实，领导工人群众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凡数十日废寝忘食，遂积劳成病，吐血不止，曾记得我有一次到医院视看他病时，看见他衣服褴褛，虽最穷苦的工人也不过是。刘华同志因贫困无钱交医金，医院遂将他搬至下等病房，次早医生到原处看病，不见刘华同志，遂问看护妇，看护妇人说，已送至下等病房，医生以刘华同志为工人阶级服务，辛苦可怜，责其仍住在一等病房，见可刘华同志之廉洁为公及辛苦服务精神感动人之深了。但还不至此，当刘华同志无钱医病，消息传在工人耳边，于是各工人情愿捐一天伙食数百元，送到总工会，

说是给刘华同志医病的，足见上海工人爱戴他的程度。然而十二月初竟在英租界被帝国主义捕去，说他参加五卅运动，扰乱治安，判送中国地界依法惩办！帝国主义军阀早已商定，遂假手于我国军阀孙传芳，于十二月十七号夜半秘密枪毙，尸首灭迹，以为可掩盖天下人耳目，哎！刘华同志为工人服务，于今数年，忍苦耐劳，不畏艰险，鞠躬尽瘁，为工人群众奋斗之精神，在上海彰彰在人耳目，若论其人格谦恭和平，忠诚廉洁，刘华同志均兼有之，真不愧为我工人之领袖了。以爱国至热诚，救国至努力之刘华同志竟被军阀秘密惨杀，军阀铁蹄之下，人道在哪里？呜呼！死者已矣！我们后死者大敌在前，我们今天含悲忍泪，追悼为民众争自由为工人阶级争幸福而死的诸位先烈及刘华，我们不要是“王小过年”照烈一拜就算了事，我们要继续死者奋斗的精神，替死者报仇，打倒一切压迫阶级，才不负我们今天追悼的意义了。工友们团结起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民族解放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原载 1926 年 2 月 7 日《工人之路》特号第 225 期）

孙良惠关于陶静轩烈士遇难 及善后料理经过的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枢委兄诸同志：

陶静轩同志死后料理事由良惠诸人负责，现已将灵柩安置在湖北同乡会馆，可算完全办妥，兹将此事经过情形报告如次：

一、静轩同志被难的原因：

(1) 因他是上海每次群众运动的领袖，知道他的太多，认识他的太多，尤其是为日本资本家想要猎获的目的物。当他被捕去次日，浦东、小沙渡即已遍传静轩被捕事，向淞沪督办公署告发者同时就纷之继起矣。

(2) 当静轩等被解逮到警厅时，有一走狗刘铸（在二、三月间尚在上总当过各地的调查）当堂指证他与于纪汉为陶静轩、于啸峰以及他过去参加种种运动的事实。

(3) 静轩同志口供不好，并曾说与王雅之是同学，这无异供认“我即是陶静轩”，并引起官厅方面对他特别注意（当时司法官说他“你起码是一个团长”）。

(4) 昨日由包探间传出来的消息,这次静轩突然判决枪杀,是因为淞沪督办丁文江具文来催促枪杀的。

(5) 我们营救是不灵敏,且觉太单方面了。

二、当静轩临刑时,据昨日当地土人及兵士说他毫无惧色,并一方面大骂军阀的罪恶,一方面向那些监兵士演说革命的意义并告诫他们不要再当军阀的走狗,赶快觉悟起来。当地土人追述他的临刑的壮烈,莫不悲愤流泪而为他呼冤,同时他们感念及本身,复述说他们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而更加与我们去收尸者一道痛哭起来。

三、当我们去收尸时,掩埋死者的土人向我们要索取多钱,复有许多兵士也在那里,我们向他们述说静轩被死的理由和冤屈,那些兵士和土人都感动流泪,不忍睹而各散去了。

四、静轩死的情形是脑后受一枪击未穿出,面部全好。至今面容如生。当时拍了一个惨杀后的遗像。

五、料理费共用去一百七十五元,除在济难会领得一百五十元外尚欠二十五元,此项迭出实为预算所不及料(另有细账附上),此款现系由码总经常费垫付,请求枢委追认。

六、料理经过时间,从早晨七时起,至晚七时始料理妥贴。

主任：孙良惠

报告

秘书：彭鸿章

十一月廿号

原载：《上海革命历史文献汇集》甲 10

陶静轩烈士生平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

陶君静轩，湖北江陵县人氏，年三十八岁，前清荆郡陆军学校毕业，光复后，在北洋十六师炮兵营充当书记等职，民国十二年来沪，经友人介绍入小沙渡内外棉纱十五厂工作，因受日资本家种种压迫，常思反抗，无以为力。十三年五月小沙渡工友发起沪西工人俱乐部，静轩已是发起之一份子，终日热心奔走联络工友，后被选为该部第二届委员长。任职以后，尤加努力发展会务，深得工人信仰，不数月，工友加入该部者日益增多，遂有十四年春上海日厂大罢工，扩大至二十余厂，罢工人数达六万余众，赖静轩与刘华等烈士领导，数万工友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忍饥挨冻，延至十八日之久，才得胜利，日人终思报复，以致枪杀顾正红，激起二次罢工，赖君终日奔走呼号，领导数万工友与日资本家奋斗。“五卅”惨案发生更加激动，奋不顾身领导数十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遂因此与刘华烈士等[颇]受帝国主义之嫉，屡思谋害，无隙可乘，不幸刘华烈士于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被军阀受帝国主义嗾使秘密枪杀，静轩幸脱危机，更不移前志，激励工友不断奋斗，以得工人阶级最后胜利。“五卅”失业即至浦东码头工作，不

幸前月二十三日夜，正值上海市民争自治之际，静轩为参加市民暴动总指挥，不料目的未达，先遭捕去，本月十六日竟以枪毙闻矣，呜呼惨哉！从此再不复见我工人领袖中最忠实、勇敢的陶君静轩之战士矣。夫陶君静轩，上弃七旬老母，下抛下八龄幼女，自些老幼将何所依？念及至此，岂不令我工人等痛泪流涕者也！但死者已矣，倘静轩死而有知，一定含泪悲啼，叫未死的工友们替他报仇。静轩之死使我工友们更认识军阀与我工人阶级是誓不两立，我们现在用不着痛心，只有踏着先死者的血迹，尽我先烈士誓死之志，前仆后继与帝国主义及走狗军阀舍死而奋斗！最后胜利终是我们的。工友们！起来，起来！与我们战士等报仇啊。

惠

（原载：《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0）

中共武汉市委通知(第五号)

——追悼武汉最近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士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自红军进占长沙以后,夺取武汉和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已成为全国工农革命斗争中之实际动员的口号。在这样伟大的群众行动的威吓之下,使武汉的统治阶级惊慌失措,于是他为维持其濒于垂危的地位起见,于是便不惜露出其狰狞的野兽的面孔,疯狂的屠杀革命领袖和革命民众。最近两月,因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士有郭士杰、吴芳、陈了君、孙良惠、邬断三、刘云、黄树扬、张特夫、张培信、何瑞芳、魏达连、陈庚峰和其他革命领袖、革命群众计不下百余人,这不过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和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者,在其坟墓门前作困兽犹斗之一幕。现在我们除继续牺牲,战士们的斗争精神加倍努力,以争取阶级决战之最后胜利外,同时市委决定在最近一次之各级组织会议上,对牺牲的战士应举行追悼,并且使每个同志要了解以下的意义。

(一) 白色恐怖是阶级斗争尖锐时统治阶级已不能和平的维持其社会秩序,而不得不采取其残酷的血的手段

之表现。它是一只纸老虎，想拿它以吓退群众，所以我们这时更应冲锋向前，以群众的威力冲破敌人白色恐怖的雾气。若有人因此而发生退守，不敢斗争和逃避的观念，那只是他的小资产阶级可鄙的怯懦的表现。同时要告诉群众，现在只有加紧发动罢工斗争，准备武装暴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选举代表出席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会，把苏维埃政权扩大到全国，才能根本消灭白色恐怖，也就是全国群众唯一的生路！

（二）最近屡次组织上的破坏，一方面因由于白色恐怖之加紧，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主观上有许多弱点，主要的是秘密工作之不注意，不知道用许多群群[众]化、社会化的方法来拥护工作和行动；组织不严密，因一个破获而牵连许多组织。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薄弱，特别是指导机关大部分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分子，政治教育工作之缺乏，以致屡次发现叛变的分子。现在我们当追悼死难烈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重大代价所换来的血的教训，坚决扩大党内无产阶级基础，严密党的组织，加紧注意秘密工作和两条战线的斗争。

（三）我们在这些战士被捕一直到牺牲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英勇的斗争的精神。他们虽受尽了敌人一切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未告诉敌自己的一个同志和党的一个机关；他们虽然在监狱中，仍然不放弃其煽动者和组织者的使命，宣传和鼓励囚徒群众，在临刑的前一刻他们

[们]慷慨高呼,从容不迫的完成了英勇悲壮的死。现在我们每一个后死者都应当记取战士们这样激昂慷慨的精神,尽我们一个布尔什维克对党最后的责任。

(四) 这些战士们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牺牲的,所以我们追悼用不着悲哀,我们只有继续牺牲,战士们的精神,更加倍的努力,与我们阶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根本击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以完成战士们未了的使命。在武汉我们应当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举行各种群众会议和示威,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反对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和革命战争,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屠杀手段作实际的抗议。

市委

(原载:《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

周恩来同志复嵇直信

关于嵇直同志所要求的证明,当我在中央工作时,他已不在中国了,故我对他不直接知道。不过,他所叙述的事,一般的都合乎事实。如张秋人介绍他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张秋人同志在1922年确是在青年团工作。而且那时青年团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直至1923年在广东开全国代表大会,才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如工人党员孙良惠为嵇直同志所介绍,当时确有此人,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同志。1924年夏,项英(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志确曾领导过小沙渡工作。1925年,张秋人和宣中华两同志在上海是可能的,贺昌同志当时确在上海工作。沈泽民同志确是1926年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的。从1925—1926年起,罗亦农同志任江浙区党委书记,赵世炎同志任党委组织部长,他们两人过问嵇直同志的事,是完全可能的,1926年9月,石琮同志确任中央交通,嵇直同志赴海参崴,由他通知并代办动身手续,完全合理。那时,梁柏台同志确在海参崴工作,由中央介绍嵇直同志给梁柏台同志也极可能。

根据上述各事,我只能证明在可能,因为我当时还没到中央(时在上海)工作,尤其不幸的是,上述这些同志,

除了石琼同志以外,全都牺牲了。故我无法为嵇直同志找到这些同志的直接证明。不过,我所能作负责证明的,即是,在当时(1926年)派人去海参崴工作,如非党员或非青年团员,是不可能被派去的,除非这个人华侨而非由党派去的。

我还记得,在1926年冬,党中央还派了陈赓同志(现任八路军旅长)及顾顺章(已成叛徒)等三人(还有一人已退党)去海参崴学习,不知嵇直同志知否此事。如知道,我还可电询陈赓找到证明。

周恩来(签名),Chow En-Lai(签名)

一九四一·一·九·于重庆

注:

嵇直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沪西从事革命工作,后作为中共党的干部被派往苏联工作。在苏联清洗和肃反扩大化时遭迫害,在处境十分危险时刻,写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1941年10月9日,周恩来复信,使嵇直免于受到更大的迫害。信中称赞孙良惠“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本件由嵇钧生提供,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回忆与怀念

关于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 俱乐部成立经过的回忆

嵇直

正如大家所知，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开始于上海的反帝五卅运动，而五卅运动的发源地，正是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现仅就这个俱乐部成立的经过，凭自己还能记忆的情况概述如下。

小沙渡位于上海西部，是日本帝国主义纱厂在上海比较集中的地区。自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就派李启汉（即李森）同志来此开始做组织和教育工作，但不久因形势的需要，他便离开此地忙于支援香港海员罢工，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和为英帝国主义者控制的上海邮局职工罢工。由于罢工获得了胜利，帝国主义者对启汉深恶痛绝，通过英租界工部局，用“煽动罢工”、“破坏治安”等罪名，先将他逮捕，后又秘密地解交给中国军阀淞沪军使何韦林。而后者禀承洋大人的意旨，也认为这是个危险人物，将他投入龙华军事监狱，长期监禁。一

九二二年秋，上海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号）市委书记张秋人同志通知我说，组织上已决定派我去小沙渡继续启汉开始的工作，并且同时仍当做些学生运动的事，因此要我不进上海大学而转到南方大学去。于是从那时起我就从闸北上海大学宿舍搬到这个工人区，在劳勃生路（现名长寿路）一家安徽人开的木材行楼上租了一间房子，并在南方大学当了个“挂名学生”。

启汉我是认识的，在他的领导下，我曾于上述两次罢工运动中做过一些工作，如印发传单，召集工人开会，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坚持共同的要求。在支援香港海员罢工时，背着一个竹筒（这是我们当时做的，即将毛竹锯成数段，每段要保留上下两个节，只在一个节上凿一小横口，以便投入钱币），手持“援助香港罢工海员”的小旗，在街头巷尾向来往行人拦路募捐，等等。可是当他在小沙渡时，在什么地方办过工人学校，而最要紧的是，有哪些工友与他接触时，我就一无所知了。因自己没有经验，为摸点线索，以便得到一些帮助，曾花费了许多时间，而结果并不乐观，但总信迟早定会有所发现，于是决定先到工人中去交朋友。

在戈登路（现名江宁路）转向劳勃生路的拐角上，竖立着一个露天邮筒，而在它的斜对面开着一家代售邮票的杂货铺。我就有目的地常到那儿去，混熟后便与它的老板商量，可否在他那“代售邮票”的招牌旁边挂一块用马

粪纸做的“代写书信，不取分文”的广告，我每天下午来借用他一点空地方为写信，并请寄信人买他的邮票、信封和信纸。他觉得有利可图，当即表示同意。我也就每天按时去“办公”。可是顾客虽然不少，但多为工人家属。不过也碰着了几个青年男工。我就对他们特别注意，乘写信的机会向他们解释学习文化对工人的好处。并说，如愿意，不妨找几个同伴来我的住所共同学习，我定尽力帮助。以后因见没有人来，我仍按照替他们写信时顺便记下来的各人地址作个别访问，并带到自己的住处，商议如何进行学习。就这样不但交到了朋友，还办起了一个工人补习班。人数虽只有四个，但我已觉得如获至宝。

开始学习的时候，就一再向他们说，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对我们劳动人民学起来没有味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一套“死”书，更没有去念的必要。我们工人应掌握的是新知识，而后者有从“活”的教材中方能获得。因此，我所准备的都是“活”的教材，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既能看得见，听得到，又能用得着，而且与自己皆有切身利益关系。

所谓“活”的教材，当然绝大部分是从我党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劳动周刊》中找来，但有时也就地取材。就用这些教材，编成一个一个的课题，每星期讲三课。在每一个课题（如“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或“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凡说到地名时，必定打开

地图,指出方位,使人能一目了然。而有些词句(如“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等等),除扼要解释清楚外,还写在纸上,教他们抄写。就这样几乎每上一课,他们都能增添一些有关工人阶级的新知识,学会一些生字,或知道一些地理常识,对此大家都尚满意。

后来鉴于来补习的工友逐渐增多,经获得张秋人同志同意后,我乃吸收了一个名叫徐玮的同学来分工合作,即他也在自己的住处办个补习班。凡住在劳勃生路以北和宜昌路的,就到他那儿去上课;而住劳勃生路以南槟榔路(现名安远路)和海防路的,则到我这儿来上课。教材和教学方法大致相同。由于徐的态度和蔼可亲,讲起课来能引人入胜,工友们对他特别满意。

大概在一九二二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刚起来正忙着在汽油炉上做饭(每天早晨做一次够吃上下两顿,那时在上海的外地穷学生,一般都是如此生活),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外貌象工人,也有点象职员,犹如老朋友一样,一进门便往床上一坐,向周围注视了片刻,就亲切地问道:“李启汉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还能回上海?你一定知道的吧?”当他见我有点紧张,没有马上回答问题,随即解释似地说道,他在同兴纱厂做过工,现临时在一家银行里当门警,但仍住在小沙渡。启汉在此办工人夜校时,他常去上课,并且按照启汉的指示,还到浦东日华纱

厂联络过工人，“五一”游行也参加了。因听说我在工人补习班上讲的话与启汉曾经对他讲的道理差不多，所以特来看看我，并乘机打听打听启汉的消息，等等。我见他态度诚恳，说话对头，也就轻松地随便与他攀谈起来，直到他起身走时，才问他的姓名以及愿不愿也来上课。他当即说：“我叫孙良惠，一定常来。”以后他果然常来，有时还带着他的朋友们来听讲。在上课时他总带头发言，用自己的体会和工人语言，帮助我解释问题。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从而不禁使我一再想到：“启汉，启汉！你在此开的荒，下的种，并没有白费。看，我不是已经发现其中的一粒正在发芽成长吗？”

关于以上这些情况，我向秋人已反映过几回，并于最后一次曾郑重表示，我很想介绍孙良惠和徐玮入SY。当见他对此不加可否，我乃继续说道，徐玮我很早就认识，是海门人，会接近群众，有鼓动能力，因反对洋奴教育，一九二一年被苏州东吴大学开除。如今思想更有进步，经常与我交换阅读我党公开刊物，很想靠拢我们的组织，如对工人补习班的工作积极，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孙良惠，据我的了解，他确实是个工人，年来因在工厂中反抗压迫和剥削，已被开除两次，现在某银行当门警，是出于不得已。他自己也认为这是替守财奴当看家狗，如不干，就又会失业。由于受启汉的影响很深，他已觉悟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光靠个人反抗，

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等等。倘若把两个人吸收入我们的组织，则对目前在沪西开展工作，定会带来不少好处。听到这里，秋人才带着同情的口吻说道，此事还得研究一下，但约定了时间让我把孙、徐二人找到我的住处，当面谈谈，然后再作决定。当大家如期会晤时，谈得都很满意。秋人乃问孙、徐，是否真诚愿意参加革命组织，严格遵守纪律，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他们的回答都很庄严而又肯定（在此不妨顺带说一下，后来由于任弼时、邓中夏、项英诸位同志的不断培养，和个人具有的艰苦奋斗精神，当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时期，孙良惠和徐玮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都做了很多工作。一九二五年五月孙曾代表上海工人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徐玮在一九二七年，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上海革命政府时，曾当选为代表青年的委员。而在“四·一二”反动政变后，孙、徐都先后为党的事业壮烈牺牲，也从而忠实地完成了自己加入革命行列时所宣称的誓言）。于是秋人便说，孙、徐二人从今就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成立上海SY第四支部，由我们三人组成。大家随即又公推我当支书。就这样总算在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始有了一个只是雏形的SY基层组织。

在上面已经说过，在这个地区此时已办起两所工人补习班，但工作总开展不起来。如与当时的安源煤矿工人

俱乐部相比，那简直望尘莫及。在支部里就这种情况曾研究过好多次，总认为两个班的共同缺点是，工友们有时来得多，有时来很少，流动性太大。当然，在我们宿舍里上课，对他们的出入有许多不方便。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不是集中在一个企业工作，而是来自内外棉四厂、五厂、八厂、九厂以及其他工厂，早晚班又多不一致。虽然按照居住地区把他们分成两组，可是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即使从总的方面来看，与我们有联系的人数比以前多了，可是这种联系并不巩固，而且仅仅限于男工。与为数众多的女工，则连一个也没有接触过。此外，当时在小沙渡的一些工厂里，如在上海其他许多工厂一样，虽然有时发生过各种类型的劳资冲突的事件，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总是扩大不起来。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同兴纱厂曾有一个女工，下班经过厂门时屡受一个印度巡捕的污辱。一回到家就痛哭不已。她的哥哥（也是工人）忍无可忍，乃约好几个同伴，于一天傍晚等着他妹妹下班又被调戏时，就一拥而上，把这个印度巡捕痛打了一顿。由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污辱女工而受不到任何惩罚，已不是偶然现象，所以当时目睹这事的群众莫不称快。但很快就有两个工人，因这次殴打事件而被捕。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随即写了许多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人身搜查”、“改善工人待遇”、“释放被捕工人”等等。带着几个来补习班上课的工友，到同兴纱厂工房等地张贴，并分别在两处举行了露

天演讲,以期激起公愤,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可是我们的目的并未达到。这就是说,在任何工厂里,如果那儿没有我们的组织,除工人的自发行动外,不管大小工潮,都是不易掀起来的。

为了开展工作,我们曾把上述情况经常向组织上作了反映,并提出过一些建议。记得秋人还先后带着任弼时,邓中夏两同志来我们这里作过亲身的了解。一九二四年春,组织上终于决定,同意我们团支部意见,在适当地点,另找一所比较宽敞些的房子,把两个补习班合并成为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上课,以便工友学习,并在课余时安排一些文艺活动。与此同时,应设法分别在工厂里建立职工小组,每个小组先有两三人也行。至于要求增派女同志去工作一事,待以后有可能再说。

根据这一指示,孙良惠就在小沙渡路槟榔路口新建的一群平房中租下一套三间,两间作为日夜班课堂,一间作为文艺活动场所。所需桌凳和乐器,主要也是由孙良惠和几个热心的工友,向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那里临时借用,或从自己家里拿来。而徐玮不等一切布置完全就绪,便在大门左旁贴上一张写着“小沙渡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字样的大纸条了。

这样一来,在工作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虽然流动性仍然很大,而来上课的人比较多了,并且又都不象从前到我们宿舍时那么拘束。每天下课后还总有人留下来,

或谈话，或下棋，或玩弄乐器。经过一个时期，在个别工厂里也开始有了二三人的职工小组，如同兴和内外棉四厂的小组，就是孙良惠首先串连成立起来的。每当市团委要我们在本区内散发什么传单，或到什么地方集合参加什么运动，支部总能带着一些工人去执行。虽然这些活动当时还不多，但大家在参加的过程中，都表现了工人阶级应有的觉悟和组织性。为联络群众，有时还举行晚会，节目虽很简单，如由徐玮和几个工友合编的双簧和小曲，但因内容都是讽刺资本家和官僚的，演唱起来，都曾受到大家的欢迎。

一九二四年夏，有一天，秋人约我去会见一个人，经介绍才知道就是项英（即项德龙）同志。听取我的汇报后，秋人便说，中央决定在小沙渡组织工人俱乐部，要我们支部从中帮助。当即商妥，先由项英同志到我们那里就地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作具体安排。我回来后随即将消息告诉了孙良惠和徐玮，对此大家莫不欢欣鼓舞，认为今后工作定能得到开展。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把项英同志带到补习学校，与早在那儿等待的孙、徐见面，并到处观察了一下，然后一起来到我的宿舍。项英乃对我们说，就在学校现有的基础上成立“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在这个星期天就召开成立大会，选孙良惠当主任并负责在各厂组织职工小组的工作，徐和嵇照旧进行教育和文艺活动等事宜。此外，还应选两三个工人当干事。在这几天

内，团支部应做的筹备事项是，尽量宣传成立俱乐部对工人的好处，并把安源煤矿俱乐部如何维护工人利益，作为例子向工人解说。工友俱乐部的章程可准备几条，其中关于宗旨一条，概称以团结互助、增进知识、改良待遇为主。其经费一项，应指明由个人自愿捐助，等等。于是我们就按照指示，分头进行。

当举行成立大会时，到会者约三十余人。会议由孙良惠主持，项英讲演，徐玮招待，我当记录。后即根据项英的讲话精神和大家的发言，把我们准备好的几条俱乐部章程草案，略加修改，由大家一致通过。并照章公举孙良惠为主任，我为秘书，徐玮和两个工友（其中一个失业工人刘贯之，因他当时表现积极，又有空闲时间）当干事。于是进行募捐，作为俱乐部的经费。当时我就把自己的硬边草帽反放在主席桌上，请大家随意捐助，但失业者可以暂免。捐款为数虽不多，可是到会者成立俱乐部表现的热忱，却很令人兴奋。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也正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宣告诞生了。

过不多久，约在一九二四年的十月间，遵照组织上的决定，我便离开了上海。当我于一九二五年六月间重返上海时，虽在时间上相隔只有七、八个月，可是随着革命潮流的高涨，由于党的坚强而又正确的领导，加上许多后来的同志，如刘华等等的英勇奋斗，这个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已不是象成立时那样，只拥有几十个工人的组

织，而竟成为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的策源地了。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于北京）

（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关于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刘贯之

一九二四年八月间，刘贯之在小沙渡戈登路口租得房屋三间；九月一日，在这里举行俱乐部成立会，由孙良惠约来几个朋友给我们工人介绍，其中一位名叫项英，说是印刷工人，其他三位叫刘华、顾秀、江元清，说是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打量他们几个人，觉得项英虽然工人打扮，但行动举止派头都像个知识分子，气派很大，不像个印刷工人；刘华长得很俊秀漂亮，确实是好学生，这些人都给我们工人一种极其良好的印象。大家经过商量之后，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担负俱乐部的事务，并推委员会负责人如下：

项 英：委员会主任

孙良惠：委员会副主任

刘 华：委员会宣传委员

顾 秀

李瑞清：委员会组织委员

刘贯之：委员会总务委员

宣布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宗旨为：“互相帮助，共谋幸

福”，当即请项英同志写成横匾，张贴在俱乐部的中堂。

随即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定试办下列工作：（一）征求俱乐部会员，会员资格暂定经过两人介绍并每月缴纳会费一角；规定会员互相保密，不对外公开会员姓名。（二）开办工人识字班，工人夜校补习班，入学的人不限定会员，凡是工人均可入学，一律不收学费；聘请刘华、顾秀、江元清等同志担任教员，均为义务职，并指定刘贯之常住俱乐部。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工作方针，是运用宣传工作来开展组织工作。开设工人识字班，文化补习班，讲演会等都算作宣传工作。

工友俱乐部这块招牌挂出之后，很快就在沪西工厂区传开了，很多工人陆续不断的前来戈登路工友俱乐部打听，有的询问俱乐部是什么作用，有的询问参加识字班或补习班的手续，有的想找俱乐部的人谈天。刘华同志在工友俱乐部担负主要责任，处理一切事务，从清早来到俱乐部，要深夜才离开俱乐部返回他的住处休息。

工人要求参加识字班的非常多，因为房子太小，虽然按一小时一班分成好几个班，仍难满足工人的需要。文化补习班也是一样的应付不暇，因为补习班只开两班，乘着识字班空出的时间上课，所以更觉紧张。担任教学的几位同志，每天都是忙得吃饭时间都不易空出来，休息就不用说了。看到工人要求学习这样踊跃和急切，项英同志建议

改变宣传方法，一方面继续识字班和补习班的工作，一方面开办讲演会，宣讲故事、时事，以及有关工人利益等项目。讲演会不一定在俱乐部房子里举行，有时借用附近的空房子，有时利用附近的空地或行人来往较少的街道，地点随时决定。讲演会发生的功效比识字班还大，容纳人数较多，宣传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工人很欢迎。

刘华同志很会说话，工人都喜欢听他讲演。记得有一次刘华讲一个女工遭受资本家虐待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引起了不少听讲的人流出眼泪。又有一次刘华讲述某工厂一个洋人监工如何辱骂工人，毒打工人，把工人不当人看待；当时有一听讲工人表示极端忿怒的高声喊道：“我们去打死这个狗腿子”，许多工人连说：“对！对！”

由于俱乐部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所以自动请求加入俱乐部的组织的人一天天增多。首先在同兴纱厂组织几个小组，不到四十天，同兴纱厂工人秘密加入俱乐部的就有三百多人了。内外棉三厂、内外棉四厂、内外棉九厂和日华纱厂等日本纱厂都跟着同兴纱厂陆续组成了俱乐部小组。中国资本家办的几个纱厂也有少数工人秘密参加了俱乐部组织。到当年年底统计，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内，有十九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俱乐部会员将近两千人。

在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同时，从俱乐部会员活动分子中挑选了一批骨干特别加以培养，其中主要的人如

同兴纱厂工友郭尘侠、李振西、韩阿四等，内外棉三厂工友陶静轩、孔言南（女工）等，内外棉五厂工友王有福等，都是后来上海工人运动中的中坚分子。担任培养工人骨干分子的工作是专由项英同志直接负责的。项英同志分批分组集合骨干分子谈话，开会，耐心教育，灌输一些爱国知识和争取人格、争取应有生活福利的斗争知识等等，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有的工友表示，应该对东洋资本家进行反抗。有的工友说，俱乐部讲演的先生不是时常说过吗，说是工人团结起来就是力量，我们工人应该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大家一致行动，就可以反抗东洋资本家对我们工人的虐待了。因此，工人们非常喜欢俱乐部的先生，并且积极希望俱乐部的先生替工人出些好主意。

项英、刘华等同志很重视工人所提出的“最好能够替工人出些主意”这一点，并且根据这一点，认真细致的研究了俱乐部今后工作方针。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影响，已使日本资本家严重注意。同兴纱厂的工友有的曾遭到监工或工头的警告，劝戒不要到俱乐部去玩耍，因为资本家无法侦知那个工人加入了俱乐部，所以只能一般的提出警告，这是东洋资本家对工友俱乐部进行破坏阴谋的形式之一种。我记得阳历过年的前几天，曾经有人到俱乐部识字班和讲演会捣乱，那时还未曾警觉到这是资本家的阴谋。后来日本监工一再劝告刘贯之不要住宿在俱乐部，并愿意给刘贯之找较好

的住宿房子,这时才初步警觉起来,认识到这是资本家企图破坏工友俱乐部。但是,东洋资本家的这些打算都失败了,工人爱护俱乐部的热忱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逐渐增加,俱乐部在工人群众中所起的影响天天在扩大和深入。

沪西工友俱乐部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是从这个俱乐部而开始打进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在这以前,共产党的组织还是以学界为主要发展对象)。例如,同兴纱厂以及内外棉三厂五厂等,都是由各该厂的工友俱乐部会员中加以选择和培养然后发展为共产党小组的。

(刘贯之:《关于 1924—1925 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第一节[节录],《中国工运史料》1960 年第 1 期,工人出版社出版)

我和沪西工友俱乐部

顾汝舫

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阴历),孙良惠来找我,说有一个俱乐部,免费教工人读书、看报,还可以练武术,问我去不去。我那时是内外棉五厂粗纱间乙班总管拿摩温,一字不识,但最喜欢听人讲报,听说有人教识字看报,正中下怀,至于练武术,那更有兴趣,于是我就跟孙到俱乐部去。我记得去过两次(俱乐部在槟榔路转角上),都是日班放工后去的,第一个晚上去,俱乐部没有什么人,是项英和我谈话的;第二次晚上去是邓中夏、刘华和我谈的,他们向我谈了许多道理,如中国工人要团结起来反抗日本老板,改善待遇等等。那时我曾听到俱乐部不要拿摩温的说法,我就问刘华是否这样?刘华说,这话也对也不对。俱乐部所以不要拿摩温,因为大多数拿摩温是站在工人对立方面的,是帮日本人欺侮工人的,如果是肯帮工人做事的拿摩温,肯站在工人方面的,我们当然还是要的。我听了很高兴,就这样加入了俱乐部。以后,我还发动了不少工人加入俱乐部。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九六五年一月访问顾汝舫记录)

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回忆

姜维新

我是一九二四年初去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学习的。学校在劳勃生路以南，东京路以东。学校的房子是个矮楼房，上课在下面，办公在楼上。听说是孙良惠找的房子。有时老师叫我们到楼上去谈话。学校门口贴着一张纸写的“沪西工人半日学校”的牌子。说是半日学校，其实我们上课只有两小时。教科书是学校发的，老师也不一定照课本讲，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

一起读书的大约有几十个人。和我一起去的有内外棉五厂工人陶汉和(坐牢死)、李宝林(被枪毙)等，记不清了，很多人都牺牲了。

教书的有项英、孙良惠，还有邓中夏等，还有一些大学生，是轮流来的。以后学校发展为俱乐部，来的人更多了。刘华来教了约一个月，即发生二月罢工。

俱乐部成立后，形式上仍上课，但我们一些骨干分子每天忙着开会、宣传，已不能安心听课。为了工作上的需要，我急切希望多认识一些字。我曾建议多印些通俗易懂的传单，最好是印些图画发给工人看。后来组织上常把一些通俗宣传品(包括画刊)和《向导》一起发给我们，这样，

我们向工人宣传就方便多了。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九六五年一月
访问姜维新记录）

关于沪西工友俱乐部

张铨

沪西工友俱乐部，是一九二四年夏至一九二五年六月，党在沪西从事工人运动的一个战斗组织。沪西工友俱乐部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在大革命初期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本文仅为这一组织勾勒出一个初步的轮廓。

沪西工友俱乐部创建的历史条件

二十年代初，沪西已是厂房林立的工业区。仅日本内外棉系统，就有十一厂设在这里。五卅运动时，上海大约有八十万工人，其中纺织工人就占二十余万；而全市五十八家纺织工厂中，有近二十家设在沪西一带。因而，沪西纺织工人是当时上海产业工人主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从事工人运动的一块理想基地，阶级基础十分雄厚。

一九二〇年秋，党的上海发起组在沪西小沙渡着手

开办“工人半日学校”，由李启汉主持，从事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接着成立了“纺织工会”。一九二一年春，半日学校改名为“工人游艺会”，并成立“上海纺织工人会沪西支部”。这些宣传、组织活动，因经费困难，参加人数不多，往往时行时辍。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沪西小沙渡工人区的宣传组织工作，也相应进行了整顿，把原有工人教育组织改名为“上海工人补习学校”，工会组织也进行了恢复，并易名为“沪西纺织工会”，党在沪西的工运工作有了发展。但是，“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1）。不久，李启汉离开沪西，党在沪西的工运工作曾出现短暂的间断。

一九二二年秋，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团组织派嵇直到小沙渡开展活动。那时，李启汉已被捕，一切工作无从接续，他只得从开办小型工人补习班做起。其间，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是中国工运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但是沪西工人运动并没有什么进展。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合作建立后，我党领导的工运中心也开始由京汉铁路、华北地区向上海转移。党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上海办起了七所平民学校，分布在沪东、沪西、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区，同时加强了对上海工运的干部配备。邓中夏从一九二四年下半年起，即离开上海大学教职，专心致力于上海工运。

李立三也在一九二四年从湖南调来上海。其他一些党的活动家，也纷纷投身于工运，使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而上海工人阶级，由于帝国主义、资本家压迫的加剧，以及党的初步工作，工人们对于帝国主义、资本家已经是“积愤既久，常思反抗”。那时工人中已经涌现出一些先进分子如孙良惠等，他们更是迫切地感到需要党做工运的引路人。

沪西工友俱乐部，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之下，应运而生，并成为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沪西工人运动的中坚组织。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建立经过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创建，是在邓中夏、项英、李立三等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李立三曾经说：“安源工人运动中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²⁾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建立及其活动，就是这些成功的经验具体运用。

俱乐部成立前，党曾派任弼时、邓中夏两同志来沪西小沙渡工人补习班考察过。当时，沪西小沙渡已有两个工人补习班，一个是嵇直主持的；一个是由嵇直联络，徐玮经办的。补习班规模都较小，分别设在他们各自住处，而且补习班中的工人流动性很大，工作难以开展。

一九二四年春，上海党组织决定把两个补习班合并，重建工人补习学校。为了方便工人群众，工人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上课。上海党组织还指示通过工人积极分子，设法在一些厂里建立职工小组，以扩大党在沪西工运工作的活动范围。为此，由孙良惠在东京路（今昌化路）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的转角上租了一间矮楼房，楼上办公，楼下做教室，屋前空地供来校学习的工人搞武术活动。当时上海教育界正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借此贴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门贴，公开进行活动。

一九二四年八月前后，项英传达了党的指示，决定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以加强党对沪西工人运动的领导。这一指示下达以后，当即由嵇直、孙良惠、徐玮、戴器吉、陶静轩、刘贯之等积极从事筹备工作。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鼓动工人参加俱乐部，对俱乐部领导人选和章程进行了仔细研究和草拟，又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拐角上租了新建平房三间，作为俱乐部的部址。

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大会是在一个星期天举行的。成立的那天，到会有三十多人。会议由孙良惠主持，项英讲演，与会者发言。俱乐部草章略加修改后，由成立大会通过。大会推举孙良惠为俱乐部主任，嵇直为秘书（嵇直不久调离俱乐部），刘贯之等两位工友为干事。会上还为俱乐部的经费进行了募捐，得到与会者热情捐助。成立会

结束后，项英根据俱乐部章程所列宗旨，在红纸上挥笔写下了十六个大字：“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端端正正地贴在俱乐部的中堂上。沪西工人俱乐部就在简朴而热烈的气氛中宣告诞生了。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战斗业绩

沪西工友俱乐部建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成效显著，其成就和历史作用可概括为下述四个方面：

一、大力开展党的宣传工作。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宣传工作，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形式多样，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既富于鼓动性，又充满战斗性。俱乐部的宣传组织形式有：工人识字班、文化补习班、演讲会等。识字班、补习班每三天有堂政治课，讲阶级、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工人团结等等。讲演会宣讲革命故事、时事，以及有关工人利益等项目。据刘贯之回忆：“有一次刘华讲一个女工遭受资本家虐待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引起了不少听讲的人流出眼泪。又有一次刘华讲述某工厂一个洋人监工如何辱骂工人、毒打工人，把工人不当人看待；当时有一听讲工人极端忿怒的高声喊道：‘我们去打死这个狗腿子！’许多人连说‘对，对！’”⁽³⁾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宣传工作也很有计划。在建立工厂秘密小组阶段，侧重于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灌输，以启

发工人阶级觉悟。二月罢工爆发后,则强调罢工斗争、建立工会,加强工人团结等方面教育。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则以这一血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和对工人的残酷压迫,以准备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

沪西工友俱乐部宣传工作的另一特点,是党派往从事宣传活动的干部阵容十分强大。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项英、李立三、刘华、杨之华等都曾到俱乐部讲过课或发表过演说。他们授课、讲演、宣传,受到工人们的普遍欢迎。工人们把接受党的教育称之为“到俱乐部里听‘道理’,影响很大。”

二、积极进行工人队伍的组织工作。

《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规定:“本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凡属沪西工人,不分男女,愿遵守本部章程者,均得为本部普通部员。”“每厂有部员三人至十人者,即组织某厂基本小组,公推组长一人;有三小组以上者,即组织某厂支部,公推书记一人。”部员“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位等项”,“不得彼此互相争斗、排斥、倾轧”,等等。(4)这些规定,反映了当时沪西工人组织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打破了过去地域、行帮观念,强调以厂作为工人队伍的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流氓帮会在工人中的不良影响,明确了各级组织和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

邓中夏说,二月罢工以前,“小沙渡方面,虽然进行过秘密的工厂小组,实际上人数不到千人,而且并不是各厂

平均发展,有些厂一二百人,有些厂数十人,有些厂一个也没有”(5)。这反映了工厂小组在各厂发展很不平衡。不过,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建立后的短短几个月中,工厂小组成员已发展到近千人,而且并不是各厂平均发展,有些厂一二百人,有些厂数十人,有些厂一个也没有”(5)。这反映了工厂小组在各厂发展很不平衡。不过,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建立后的短短几个月中,工厂小组成员已发展到近千人,在十九个厂建立工厂小组,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在成长。

二月罢工中,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从长期斗争考虑,又结合斗争努力于工会组织工作。内外棉、日华、同兴、丰田等纱厂工会,都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在党的领导下,“各纱厂工会先后组成了工厂委员会,推定了负责人,随即开展工会会务工作”(6)。随着二月罢工的发展,以沪西工会俱乐部为中心,在沪西出现了一个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时期。

俱乐部组织工作上的另一重大成就,是“沪西工友俱乐部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是从这个俱乐部而开始打进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在这以前,共产党的组织是以学界为主要发展对象)”(7)在二月罢工前,以小沙渡工厂区来说,同兴、内外棉三、五、十五等厂都建立了党的组织。这在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很大跃进。

俱乐部建立后的不到半年中，沪西工人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象刘华、孙良惠、陶静轩、顾正红等这样一批优秀的工人阶级骨干。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广大工人在一起，愈战愈强，愈来愈壮。“五卅”以后，纱厂总工会成为上海总工会的主要支柱之一，这些都与俱乐部这一时期的组织工作分不开的。

三、及时领导了二月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清晨，内外棉八厂厂主蓄意制造事端，殴打女工，开除男工，指使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促使八厂工人罢工。罢工以后，日本资本家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压迫愈甚，因而激起沪西、沪东二十二家日商纱厂大罢工，参加罢工人数达三万五千余人，罢工持续二十余天，停止运转的纱锭达六十万枚，造成日本资本家的损失仅内外棉各厂就在百万日元以上，是为二月大罢工。

二月罢工开始以后，沪西工友俱乐部立即由租界区的槟榔路迁到华界潭子湾，使“潭子湾成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上的一个纪念地点，五间旧平房也成为上海工人阶级的首次战斗司令部。”(8)

俱乐部，在这次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它在工人中的组织领导作用。二月大罢工期间，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及时地加强了对沪西日商纱厂工人斗争的领导。罢工开始后，俱乐部考虑到当时纱价低落，美棉奇涨，日本纱厂自恃实力雄厚，“正是日本纱厂加紧打击中国纱厂的时候，

自然不愿因罢工而闭厂”(9);同时,更考虑到“工人群众愤于一百余名工友的开除,愤于领袖被捕被打,群情异常激昂,恨不得立刻就要下手”(10),因此就及时率领工人大罢工。当罢工扩大到将近日商在沪本部纺织业,罢工要求得到一定允诺时,俱乐部又及时把斗争引向转入巩固成果,并向工人指出:“罢工数十天之久,但凡事总有一定限度,现在警察厅长、交涉员、总商会都出面调解,因此,我们必须有所让步。”(11)因而在达成协议后就于三月五日胜利复工,使二月罢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由于上海党组织在这次大罢工中投入了几乎所有的力量,并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对这次罢工实行了具体领导,因此二月大罢工“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

四、迎接五卅运动到来

二月罢工是五卅运动的前奏。二月罢工使日本朝野上下大为震惊。日本资本家决心进一步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自复工以后,“日人虐待,反变本加厉。日人监工入厂,皆携带铁棍手枪,工人偶一不慎,即遭棍击。罚款之苛,数倍于前”(12)。日本资本家对沪西工友俱乐部更是深恶痛绝。叫嚷:“欲先将罢工工人全部歇退,再行另招工人,然后广投巨资,设立工人俱乐部”,“以谋劳资双方之协调”(13),显然,日本资本家在图谋反攻倒算。

沪西工友俱乐部“每天都在那里举行会议”(14),研究对策。当时棉价继续升高,纱市清淡,罢工对日厂威胁

不大。俱乐部就带领工人进行轮流怠工。从五月初起,内外、同兴、日华等厂工人纷纷怠工,彼伏此起。日商纱厂产量不足,工资要发,使日本资本家十分狼狈,难以招架。

五月十五日晚,内外棉七厂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血腥罪行。事发后,日人勾结帝国主义、军阀进行镇压,并迫使中国报纸不得登载工人斗争的消息,妄图扼杀再次兴起的工人斗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沪西工友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团结广大工人,争取社会同情,一面发动罢工,一面发表宣言。俱乐部派工人代表领出顾正红尸体,举行迎柩大会,扩大影响,并在俱乐部门前搭台吊祭。每天前来吊唁、慰问的各厂工人、学生、各界代表络绎不绝。参加全国二次劳大的北方工会代表,路经上海也前往慰问,并表示回去后立即发动援助。五月二十四日,在潭子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顾正红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有一万多人。一位记者感慨地说:“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集会,在上海我敢说是空前的。”(15)

五月二十八日,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扩大上海的反帝斗争。沪西工友俱乐部立即组织工人代表,配合学联,分赴各大学,揭露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的真相,控诉日本资本家勾结巡捕房逮捕、审讯援助工人的学生,要求他们和工人站在一起,鼓励他们于五月三十日到南京路上示威演讲。

因此,尽管当时“我同胞均含默不言,新闻纸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16),然而,俱乐部根据党的指示,率领日厂工人进行不懈的斗争,最终打破了那时的表面沉寂,燃起了千万人的心头反帝怒火,推动了五卅运动的爆发。

“五卅惨案”当天,下午四点钟,沪西工人俱乐部为“五卅惨案”召集沪西各厂工会干部一百多人开会,积极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六月六日,沪西工友俱乐部参加上海总工会所属四十四工会联署的致全国各工会呼吁书,呼吁全国各工会对上海的反帝运动进行援助。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沪西工友俱乐部的活动最后一次公开报道(17)。此后,上海总工会发出通告,为办事便利起见,特设五个办事处,小沙渡为第四办事处。至此,沪西工友俱乐部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战斗历程到此才告一结束。

注:

(1)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2) 《看了〈燎原〉以后》,载一九六三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

(3) 《关于1924年—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载全总:《中国工运史料》,一九六〇年第一期。

(4) 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就目前所见有两种版本:

一是《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载于日本商业会议所编：《我国纺织业罢工事件以及各地的动荡》第一辑中，是中文；一是《沪西工友俱乐部规则》载于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一书，是日文，由《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译成中文收入。两个本子基本相同，某些条文有出入。本文是引用《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

(5)《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载《中国工人》第四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

(6)(7)《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载全总：《中国工运史料》，一九六〇年第一期。

(8)《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载全总：《中国工运史料》，一九六〇年第一期。

(9)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10)《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载《中国工人》第四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出版。

(11)宇高宁：《支那劳动问题》，第658页。

(12)《内外棉纱厂工会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涉使文》。

(13)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

(14)《上海工部局一九二五年报告》第6页。

(15)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民国日报》。

(16)梅电龙编述：《上海英帝国主义者屠杀同胞之经过》。

(17)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民国日报》。

(原载:《党史资料》丛刊 1980 年第 3 期)

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

姜维新

一、组织半日学校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项英（项德隆）同志转移到上海，住在沪西同兴纱厂工房内。我和项英同志认识大约在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开始我们在内外棉五厂东厂（即现在的上棉二厂一部分，上棉二厂系原内外棉五厂东、西厂、七厂、八厂、十二厂五个厂组成），有四、五个工人与他联系，每星期谈三、四次。项英同志也是工人出身，和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叫我们团结工人，把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就以结拜兄弟的形式，很快把一批工人团结在周围，组织了工会，原来厂里一些工贼和流氓组织的工会很快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不久，我们在内外棉九厂（即上棉四厂）外面靠白礼氏洋烛厂的旁边，租了一间楼房，成立半日学校，又称平民夜校，这就是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前身。那时，党的领导人及上海大学的一些进步师生经常来半日学校讲课；找工人谈心，其中有李立三、瞿秋白、吴雷、杨之华和邓中夏等同志，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同志也常来。陈独秀还

到过我家里，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给我的印象较深。邓中夏同志在二月罢工时。是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湖南人，工作踏实、耐心，讲课时经常问工人懂不懂。记得有一次他对工人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资本家的肚子大？因为他赚了工人的血汗钱都装进肚子里去了”，引起工人们哄堂大笑。李立三同志为人坦率，工作有魄力，很精干，几乎每天都到半日学校里来。半日学校上课的内容，主要是结合学文化讲政治形势，因为学生都是年轻人，根据这一特点，也组织一些文体活动，如踢球、唱歌等。

不久，半日学校被戈登路（现江宁路）巡捕房封闭，邓中夏同志即来稳定我们的情绪，要我们坚持斗争，继续办下去。大家商量结果，采取“群众启封”的办法，把封条撕去，将课桌椅搬到小沙渡路（现西康路）槟榔路（现安远路）口，三间朝东平房里，继续办学。当时组织文体活动的负责人是张维桢同志。刘华同志虽是中华书局的工人，但很热心，也来半日学校参加活动，并住在半日学校里，工人群众有什么事情，经常找他商量。这所半日学校，就是我们经常所称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它是沪西工人活动的中心，党的领导同志李立三、邓中夏等经常在此开会，二月罢工就是在这里筹划和组织的。

二、组织罢工委员会

沪西是上海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日本纱厂有内

外棉株式会社的三、五(分东西二厂)、七、八、九、十、十二、十五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这些厂工人的工资低,一般每天只有两、三角钱,有时还要罚工。日本资本家还订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日本监工经常野蛮地殴打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早想组织起来反抗,半日学校成立后,成为团结沪西纱厂工人的核心,很自然地酝酿着罢工斗争。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内外棉八厂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激起工人义愤,爆发了沪西纱厂总同盟罢工。罢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罢工委员会。那时在安远路半日学校开会,各厂都有人来,共到几百人,坐满了三间平房,党的领导人到会的有瞿秋白、李立三、张太雷、邓中夏、刘华等。那天,陈独秀也来了,布置了一下工作后走开。会议由李立三同志主持,谈了形势,并说明成立罢工委员会是在事先开过多次会议进行酝酿决定的。立三同志报告后,全场一致同意成立罢工委员会,推选立三同志为总负责人(委员中我记得还有刘贯之同志)。会上决定了七项条件:一、不准日本人打骂工人;二、增加工资二成;三、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四、同工同酬;五、改良待遇;六、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七、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这些条件后来印成传单,分发到各厂。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内外棉五、七、八、十二厂。

罢工首先由五厂东厂开始,该厂成年工人较多,骨干

力量比较强。五厂罢工后，日本资本家将所有的厂门都上了锁，不准工人出门，并加强警卫，巡捕房亦派来巡捕。工人们不顾阻拦，从厕所间的窗口爬了出去，内外呼应，将门锁打开，七厂、八厂、十二厂跟着罢工。五个厂的工人集合在一起，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巡捕房的包打听假装“调停”，说有事可派代表出来商量，不要罢工，并问是谁带头的。我们看穿了其中阴谋，拒绝派代表谈判。并指着传单说：“我们没有带头人，这七条就是我们的头头。”

五个厂罢工工人近万人，都摆渡到潭子湾三德里前面广场上集中。三德里那里，原有几间空房，因不属租界，又有空地，开会活动比较方便，罢工委员会就在那里办公，沪西各纱厂的工会都设有那里，后来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也设立于此。工人们集中以后，临时搭了一个主席台，召开大会，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和刘华等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立三同志重申了七项条件，肯定了这次发动罢工的成绩，同时强调了罢工要遵守秩序，听从罢工委员会的指挥，坚持到底。立三同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群众利益，所以工人一致同意。刘华同志还当场宣布正式成立纱厂工会，并组织纠察队。各厂工人代表也发了言。会上，有人提出沪西还有些厂没有罢工，应当发动他们罢工，立三同志说：“这事明天再讲。”

第二天，五个厂的工人又集中在潭子湾开会，决定游

行到沪西其他各纱厂，动员罢工。队伍从潭子湾出发，到恒丰路四区八署警察所前，和警察发生冲突，队伍被打乱，并有人被捕。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又集合一千多人，到叉台角九厂动员罢工，在九厂工人内应下，也罢工了。工人们走出工厂和我们一起，到戈登路同兴纱厂（现一〇一厂），同兴也响应，再到三厂、四厂、日华纱厂，最后到丰田纱厂，这些厂的工人立即响应罢工，著名的二月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终于开始。这是上海工人在一九二五年响起的第一个春雷，也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三、与日本资本家谈判

二月罢工开始，我参加了纠察队。纠察队的工作是艰苦的，每天早晨三时即出动值班，时值天寒，风雪交加，衣裤单薄，常常冷得发抖。值班的任务主要是在交通要道口，劝阻一些被领班和工头逼迫来上班的工人不要上班，有时遇到一些工贼、走狗，我们发出警告，若不听从，即把他们拉到工会来说服教育。我那时不回家，同刘华同志一起住在三德里。刘华同志工作踏实，热情很高，能与工人共甘苦，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后来在五卅运动时，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主任。

罢工坚持了十多天，我们曾和日本小大班川村谈判，地点在戈登路三十号（现江宁路、安远路、长寿路之间）日本俱乐部，我方李立三、邓中夏两同志都未出面，由孙良

惠同志率领工人代表参加。川村急于想工人复工，态度嚣张，施用压力说我们闹事，我们据理反驳。川村赤裸裸地说：“我们来上海时资本廿八万元，现在经营十多年，值八百多万元，中国政府是买不起的，如果我们关厂，你们就要失业”等等。工人代表越听越气愤，谈判进行了三小时，未有结果。

后来，由日本资本家元木出面，要我们到租界去谈判。我们看到罢工太久，同意谈判，但坚持不去租界。事前，邓中夏同志警惕地告诉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能到租界去谈判，地点要由我们来决定。”最后决定在舢板厂新桥北堍明月楼茶馆谈判。谈判前，李立三和邓中夏同志作了成功或失败的两种估计，订出周密的计划。这次谈判，李立三同志未出面，由邓中夏到场，各厂代表都参加，茶楼挤得满满的。谈判结果，元木同意增加工资一成。对承认工会问题，元木借口中国没有工会法，无从谈起，但表示对现在成立的工会给予承认，并拨出两间房子作工会活动场所，（今江宁路玉佛寺对面），我们因地临租界，不便活动，为警惕起见，工会仍在三德里办公。关于同工同酬问题，元木在原则上同意，但强调注意质量。最后，双方在谈判书上签了字。我们这次提出的条件，大部分得到解决，取得了胜利，曾在潭子湾召开大会，放鞭炮庆祝。但复工后，这些条件并未实现，相反，资方更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到五月初，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又在党的领

导下掀起了一次罢工斗争，导致了震动中外的五卅运动。

四、顾正红遇害

二月罢工后，日本纱厂资本家不履行原已议定的复工条件，工会多次交涉都无结果。五月上旬，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决定，不承认工会，并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党决定再一次进行罢工，并总结了上一次罢工中的经验教训，在策略上有所转变，不采取总罢工的形式，而采取轮流罢工和怠工的方式。五厂东西两厂和八厂、十二厂先罢工，七厂则照常上工。因七厂是织布厂，纱厂罢工后，原料缺乏，开工不足，但工人工资仍需照发，开始还发全工，后来改发半工。到五月十五日，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将七厂厂门关闭，不准工人上工。七厂工人要求上工，聚集在厂门的有五、六百人，随后将厂门冲开，由顾正红同志带头冲到办公室前，准备与日本资本家评理，但到办公室门口时，内外棉株式会社副总大班元木、小大班川村等，带了一批人冲出来，川村瞄准顾正红同志开枪，顾正红同志身受重伤，继续率领工人前冲，最后扑倒在七厂和八厂转角的路上（现国棉二厂顾正红烈士塑像处），经工人同志抢送医院，因出血过多，不治身死。在此同时，大部分工人准备到三德里去，在渡船上发现有一日本人冒充工人，准备到三德里去探听消息，工人们将他扭住，被在围墙顶上岗亭中的日本哨兵发现，朝下面开枪，

当场打死一工人，另一工人中弹后落水淹死。这两位工友的遗体 and 顾正红烈士遗体，均用棺木入殓，开追悼会时放在一起。

惨案发生后，一面由工会筹备召开追悼会，悼念烈士，扩大影响；一面由李立三、刘华等同志讨论决定，将惨案经过公诸社会，争取社会支持，同时发动工人募捐，支援罢工工人。

追悼会开得十分隆重，各工厂工人和各界人士参加的有1万多人。会场在潭子湾三德里东边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李立三同志在会上痛斥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工人踏着烈士们的血迹，把斗争进行到底。各界代表相继发言，群情愤激。各界送的挽联也很多，挂起来成了一个帐幕，会后整整装了三大板箱。当追悼会进行时，军阀孙传芳派军队进行镇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但工人们继续开会，毫不动摇。当时杨之华和刘清扬等同志率领大批女工去说服这些军队，激发他们民族感，讲得声泪俱下，十分动人，有的军警被感动得流泪，也站在一边参加追悼会。

五、工人学生大联合

革命的学生对工人斗争一直是很支持的，很多工运干部都是学生出身。在平日学校时，来讲课的大部分是上海大学的学生，早在二月罢工的时候，大夏大学的学生在

宿舍里(现光华啤酒厂一带)帮助我们印刷传单,也有一些同学被捕。顾正红惨案发生后,我记得在当时的中央执行部里,即环龙路(现南昌路)四十四号开过一次会,约有几百人,主要内容是动员上海各学校学生支援工人斗争,决定由各学校学生领着工人到学校进行宣传。我和另外两位女工,由复旦的同学领着,以总工会筹备处的名义,到复旦大学去报告顾正红惨案的经过。到了复旦大学门口,门房不理睬,后来学生叫我打钟,钟声一响,同学们都蜂拥而来,有位同学叫我们到台上去,一位姓芮的女工以亲身经历,讲了工人的痛苦以及顾案的经过,我又补充了一些,同学们听了都十分气愤。有人当场提议募款援助,因事先无准备,临时找了一条短裤衩,装满了募得的银元、毫币、铜元等。有些同学气愤得将书桌打翻,有些同学到学生会,要求赶快采取行动支援顾案。其他各校也有类似情况。后来,上海学生总会开会,决定发动学生进行募捐,并派出演讲队,进行宣传,声势更为浩大。

六、五卅惨案和上总成立

五月三十日,李立三同志给我两箱传单,指定我到三马路(现汉口路)浙江路口的一家旅馆里去分发。我将传单分发完毕,即到南京路,看见老闸捕房前,站着一排排的印度巡捕。南京路上挤满了人,不久,因为英国人逮捕了演讲的学生,群众在巡捕房前示威。见一个外国人从永

安公司那边向老闸捕房方向逃来，后边群众亦在追赶。当群众赶上时，捕房前的印度巡捕竟无人道地一齐举枪射击，当场击毙十多人，受伤的更多，南京路上倒下了一批人。我所记得牺牲的人中，有一位是同济大学的尹景伊烈士。五卅的情况，记载甚多，不再详述。

五月卅一日和六月一、二日，帝国主义还在屠杀中国人民，在四川路宁波路口和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近，都发现有中国人被打死。当时，帝国主义控制的万国商团和英国水兵都住在跑马厅东首（现音乐书店一带）和新世界地下室里，他们害怕群众冲击，在租界上用沙袋筑起堡垒，并调动军队，镇压工人、学生。外国人的一些家属大都转移到了军舰，准备撤退。

五卅以后，上海总工会成立，李立三同志被选为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当时是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少奇同志讲话湖南口音较重，不易听懂，所以一切公开场合，都由立三同志出面讲话。立三同志十分机警，警惕性很高，他出去经常带了几个和他面貌、身材相似的工人，一起乘车，以扰乱敌人的视线。而少奇同志总是埋头苦干地工作，事情不分巨细，他都过问，还负责纠察、筹款等各项具体工作。当时他和何宝珍同志都住在共和新路集体宿舍楼下的厢房里。

五月卅日惨案发生后，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声势浩大，但是商界却没有行动。于是我们开始了一场包围总商会

的斗争。

七、包围总商会

自从二月罢工以后，民族资本家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希望日商工厂工人罢工，减少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又怕罢工会罢到他们的头上，影响生产。在二月罢工时，大丰纱厂的资本家一面资助过我们一千元，一面又叫我们不要声张，害怕日本资本家知道，这就是他们内心矛盾的表现。

五月卅日当晚，工人学生数千人到天后宫桥（现河南路桥）北堍总商会门前，包围了总商会，要虞洽卿、傅筱庵出面，宣布罢市。总商会说虞、傅不在商会，罢市不能决定，于是又有一部分工人到海宁路包围了虞洽卿的住宅，仍无结果。工人群众把总商会包围了一天一夜，有的工人和学生因身体衰弱，晕倒在地，仍坚持不走。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时，总商会在群众压力下，才宣布各马路中小商店先罢市，至于南京路四大公司罢市问题，还得再商量，并同意和总工会、上海学生总会等团体谈判。去谈判的总工会代表是李立三同志，学生总会代表是林钧。不久，就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

五卅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斗争，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后，国内外团体均捐款支持罢工斗争。苏联工人和第三国际均汇款支援，连英国工党的麦克唐纳也捐款援助。

款项由总商会收集,由各工会办事处发放给罢工工人作为救济费。当时上海总工会设有沪西、沪东、南市、浦东、闸北、虹口六个办事处,后来又设立了吴淞办事处。总商会一直拖拉,不肯付款。李立三同志经常为此事到总商会交涉,有次我和立三同志为了发放工人救济费问题,直接到虞洽卿家里去谈判。因罢工人数多,据总工会统计,每日罢工工人一般有十六、七万人,救济费支出浩大,再加上总商会从中克扣渔利,筹措非常困难,李立三和刘少奇同志曾为此不辞辛苦,多方奔走,一直坚持到复工为止。

在总同盟罢工时,刘华同志病得很厉害,李立三同志十分关心,嘱我送他到医院,并由我在医院进行护理。我陪刘华同志在宝隆医院(现长征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又调养了一个时期身体才复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刘华同志被捕,不久被杀害。病魔没有夺走他的生命,却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壮烈牺牲了。回顾这些革命烈士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精神,再看一看今天社会主义祖国的新貌,使我感到自己虽年逾八旬,但仍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把过去革命斗争的历史事实回忆出来,也是我应尽的义务。五卅运动到现在,已有五十五周年,有些事实早已遗忘,有些因年长月久,记忆可能有误,希望同志们补充或订正。

(张传仁整理)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三辑)

回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及其他

(节录第二部分)

姜维新

三次武装起义

“红色恐怖队”后来发展到几十个人，中央开会我们还做保卫工作，这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为了进一步发展工人武装，一九二六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军委在康梯路（现建国西路）菜市路（现顺昌路）的一所小学里办了个武装训练班，有五、六十人，我也参加了这一训练班。训练一般的列队操，以及进攻后退等作战方法。罗亦农、赵世炎、蔡和森等都来讲过课。顾顺章也来过。周恩来不上课，专门找人个别谈话，做政治思想工作，记得蔡和森还笑着对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打头阵的”。可见，中央对我们这支武装力量是十分重视的。后来，组织上布置我们参加武装暴动。

第一次武装暴动是因夏超兵变未遂。暴动没有成功。当时，我们在虹口有五、六十人，准备攻下五区警察所（在横浜桥附近一条弄堂里），但因为都不会用枪，结果枪走火造成泄密，只得停止行动。沪西区工会负责人陶静轩带了一批人曾攻下枫林桥的水上警署，但因没有群众配合，

结果反而被捕，惨遭杀害。南市区没有动，主要是群众没有很好的发动。

第二次武装起义我们没有行动，因为罗亦农讲，听到炮声就打，但我们没有听到炮声，所以没有行动。

第三次武装起义是有准备的，群众发动充分，上海八十万工人差不多都发动起来了。当时，我在南市区。起义前一周，我在训练班里遇到罗亦农、赵世炎，他们布置我在南市警察局（在蓬莱路）附近租一间房子，负责放火作为信号。当时，周恩来也在场。我还问他们，吴淞炮台怎么办？他们笑笑回答说：这你不要管，你只管放火后跟着大家跑就是了。听了这些我知道领导胸有成竹，不必多问。顾顺章当即给我一支白朗宁手枪和一颗手榴弹。我按照指示在南市警察局后门租了一间房子，并准备了放火用的火油等物。起义那天，中午十二时正，我按规定放了火。接着区的副总指挥孙良惠叫我到前面去看看，我朝前走到警察所就朝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孙和我便冲进了警察局，大家也都冲进去缴了警察的枪。后来，我们又去小南门集中，并将机枪放在汽车顶上，去攻打制造局（现江南造船厂）。制造局里驻扎着一营军队。当我们冲进去时，敌人乘船逃跑，中途翻船淹死了不少人。我们攻占了制造局之后，又没费多大力气，拿下了水上派出所。这样南市很快全拿下来了，大家情绪十分高涨。南市区纠察队主要集中在南站（即现车站路）和电车站，指挥部设在三山会馆

(是水木两作行会的会馆),我在那里办公。起义后,周恩来叫我管枪支弹药。南市攻下后不久,闸北区在周恩来亲自指挥下也攻下来了。我们南市区打算开出火车支援北站,周恩来说你们不要来了,北伐军离我们不远了。薛岳部队只在大洋桥那里开了一炮,北站的敌人就慌了,毕庶澄的军队全被打散了。后来,周恩来叫我移交掉南市的工作,到闸北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第三大队当大队长。第三大队指导员是徐书平,纠察队员都是工人,分布在大工厂,力量比较集中,不象南市区那样分散。“四一二”前,蒋介石指使黄金荣组织“共进会”,制造谣言说我们要冲租界,并污蔑我们干坏事,进行抢劫。所以,周恩来一再关照,纠察队要遵守秩序,不要随便离开岗位,并要我们提高警惕。

(原载:《党史资料》丛刊 1980 年第 2 期)

孙良惠革命活动踪迹寻访记

华校生 刘景成

孙良惠是我区和上海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也是我区最早有记载的党组织负责人。在他的光辉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我区从事革命活动。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们在浩瀚的史料堆里搜集、千里寻访和艰辛地编纂，一个为上海和我区工人运动作出非凡贡献的英烈逐渐为人们所熟悉。本文从一个侧面，介绍寻访孙良惠在上海革命活动的历程，以资对先烈的缅怀。

我区第一代产业工人

孙良惠是我区开埠以来的最早工人之一。

1899年，本区吴淞江南岸大部分地区被列强划为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区域，外商利用水运之便，纷纷在我区小沙渡路（西康路）、戈登路（江宁路）、劳勃生路（长寿路）一带开办工厂，许多江、浙、皖等地区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涌入本区做工，孙良惠一家亦是这支劳动大军的一员，到上海在戈登路1433号日商同兴纱厂内找到一份工作。（该厂地处江宁路北端、临苏州河边，1941年改为侵华日

军的同兴小川工业公司军服厂。抗战胜利后，改为国民党军政部上海被服总厂。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部接管，改制为生产军服的101厂。1969年改制为上海仪表系统的生产广播电视整机的101厂，现已拆除）。

孙良惠和成千上万的工人一样，在工厂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天未亮上工，天黑才回家，每天拼死累活地做工，而得到的工资极其微薄，每天过的总是吃不饱、饿不死的生活；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劳动条件的保障，没有人身安全；在政治上，工人是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和地位，资方可以任意殴打、凌辱和开除。孙良惠和所有的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和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悲惨万分。孙良惠等工人在现代产业的大生产中，养成他们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和具有中国工人阶级强烈的反抗性、战斗性、坚韧性的高贵品质。但是，当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尚未在工人中传播，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还未出现，孙良惠等一批工人还只能停留在早期的工人自发斗争上，这时候，他们只能进行零星的、没有战斗力的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斗争。

在工人半日学校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1920年6月，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经过酝酿后，在

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建党和到中国工人集中的地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活动。这年秋，派遣小组成员李启汉到上海纱厂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一所工人半日学校，校址在槟榔路锦绣里（今安远路 62 弄 178、179、180 号）。这是一幢两层楼房屋，是日商内外棉九厂的工房。李启汉主持办学并任教，寒假期间，将学校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吸引更多工人。孙良惠做工的同兴纱厂离工人半日学校很近，所以成了最早的一批学员。有一次，李启汉上课时说：“从前只是个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的联合起来，讨论办法”；“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孙良惠被李启汉的演讲深深打动。他如饥似渴地一面学文化，一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提高很快。李启汉在工人半日学校基础上，帮助工人筹组沪西纺织工会，大家推举学习最认真、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工人孙良惠为负责人。1921 年 4 月，由李启汉主持，在渔阳里 6 号外国语学社召开有 10 多个劳工团体参加的五一节纪念筹备会，孙良惠代表沪西纺织工会出席会议，并一起筹备纪念活动。尽管同年 5 月 1 日的活动遭敌人破坏未能进行，但孙良惠仍在沪西地区散发传单。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诞生，孙良惠由于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他的觉悟和才能在工人中很快脱颖而出。1923 年 11 月，孙良惠由嵇直介绍

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转为共产党员，成为沪西地区最早的工人党员。

同兴工房里的烛光

同兴纱厂工房（现澳门路 524 弄内）是孙良惠一家居住的地方。这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工房，位于同兴纱厂的南面。我们曾千方百计地寻访孙良惠的确切的居住门号，无奈由于时间相隔太久，许多与孙良惠共事的战友大都已作古，很难再能找到孙良惠早年居住确切的地方。幸运的我们最终还是找到曾与孙良惠共事过、目前唯一在世的刘桂宝老人，她提供了如下情况：“孙良惠是南京旗人（满族人），当时我们都住同兴工房，我住前弄，他住后弄，他和杨福林（早期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普陀区副区长）住得靠近。我们还经常在孙良惠家里开会，他家里有母亲、姐姐和姐夫。”又据居委会、派出所介绍，同兴工房里的二、三十年代的居民，早在抗日战争后全部搬迁了，去向不明，原来的同兴工房大都还在，只是最后一排房子，亦即孙良惠曾居住过的已拆除。为了寻找孙良惠的亲属，我们曾登报发布寻找启事，请长寿路街道居委干部查找，在普陀区 69 名满族人中寻找，又据刘桂宝老人提供的线索，还查找了南京城内满人集中居住的“吉祥街”100 多户旗人户籍和“吉祥街”周围 700 多户居民户籍资料，始终未能发现孙良惠亲属的任何线索。

现在证实孙良惠的原住房已拆除，他的亲属亦渺无音讯，真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但是，这不能阻断我们对先烈的缅怀，我们在刘桂宝老人的回忆中，仍能依稀地感悟到孙良惠在简陋的同兴工房内，在一支忽闪忽暗的烛光下，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们谋划沪西工人解放的伟大事业。

国民党区党部里的中共工人代表

1924年2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环龙路44号（南昌路180号）成立，共产党和国民党各派代表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但是作为脱颖而出的工人代表孙良惠是否被选派进驻上海执行部工作，很长时间没有资料反映。后来，经查阅许多档案，最终查到1925年6月1日出版的《党务月刊》中工人运动委员会名单上有孙良惠名字，并经我们认定，这是1924年5月，上海执行部工农部为适应形势需要又设工人运动委员会，孙良惠是委员之一。参加上海执行部的中共党员有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向警予、李立三、邓中夏等同志，国民党方面的有胡汉民、汪精卫、叶楚傖、于右任等人。孙良惠等一批中共党员积极分子以国民党的名义公开募款、宣传、慰问、集会等方式支援上海的工人运动，他们还以执行部的农工部名义组织工人参加“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声援工人罢工，从而在推行孙中山的扶助农工

政策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带头人

1924年9月1日,孙良惠被大家推举新成立的“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自此沪西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的革命摇篮,在这里培养许多革命人才、孕育着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许多伟大事件。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地处小沙渡路(西康路)、槟榔路(安远路)相交的德昌里(安远路278号)。原有的俱乐部早在解放前已被拆除,改建为新的楼房,而现在又改建为新的工房了。但是沪西工友俱乐部伟大的历史功绩没有被湮没,我们在中央档案馆和许多革命历史教课书里,都能查到这段历史:这天,孙良惠主持揭幕典礼,由项英作演讲,公布由邓中夏、李立三起草的《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这个章程共计21条。会议结束后,项英亲自提笔把章程中规定的宗旨“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16个字写在大红纸上,贴在堂屋正中,请大家切实遵照执行。到俱乐部教书和演讲的,大多是上海大学的师生,如邓中夏、刘华,此外还有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向警予、杨之华、李立三、项英、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等同志来上课。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后,像磁铁一般吸引了周围工厂的广大工人,到年底,已有19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下属秘密组织,有会员近千人。孙良惠和他的战友刘华、陶静轩等同志一起以沪西工友俱

乐部为革命的基地，不久就成为点燃中国大革命的星星之火。

上海二月大罢工的领导人

小沙渡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在 1925 年初搬迁到吴淞江北岸华界的潭子湾三德里(潘家湾路 277 弄 19—22 号一带,现亦已拆除,为中远两湾城区域),这里同样是我区的革命基地。孙良惠等俱乐部领导为避开租界当局经常对沪西工友俱乐部活动的干扰和破坏,便决定俱乐部由租界迁到洋人和“高等华人”不愿去的贫民窟和荒地、坟地、菜地的潭子湾。潭子湾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发展规模更大,并成了孙良惠和邓中夏、李立三一起领导发动威震上海滩的上海日商纱厂二月大罢工的战斗司令部。罢工胜利后,沪西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并为即将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同年 6 月 13 日,在潭子湾三德里原址设立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1977 年 12 月,这里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列为市级革命纪念地。

在潭子湾广场公祭顾正红

1925 年,声势浩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如燎原烈火,席卷全国,震惊世界。而最早燃起这场运动星星之火的地点是在潭子湾。顾正红被枪杀事件发生时,刚从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结束返沪的孙良惠得悉这个噩

耗，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向帝国主义开展斗争，公祭顾正红，决定在潭子湾广场（空地）举行上海社会各界参加的万人公祭顾正红大会。潭子湾广场在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的南侧，本是个荒凉空旷的坟堆之地。5月24日，会场布置庄严肃穆，四周挂满了各工会、各团体送来的挽联、挽幛，台上中间顾正红烈士遗像两旁，悬挂着刘华亲笔写的挽联：“先生已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孙良惠为公祭主席，宣读祭文，全场高呼“为顾正红报仇！”“打倒帝国主义！”口号。这次公祭大会进一步激发了全上海人民的反帝斗志，并成了中国人民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导火线。五卅惨案爆发后不久，孙良惠和李立三、刘少奇都成了反动派通缉追捕的“首犯”，但是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斗争，使得孙良惠的战斗精神更加旺盛，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潭子湾广场公祭顾正红”，已永载史册。

浦东工人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爆发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孙良惠被党指派为浦东工人起义的总指挥之一。1926年6月，党组织任命孙良惠为上海码头总工会委员长，他的战友陶静轩为副委员长，两人相约在浦东秘密组织工人。陶静轩不幸在吴家厅码头指挥所被逮捕牺牲。孙良惠亲自为中共上海区委写了“关于陶静轩烈士遇难

及善后料理经过的报告”，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陶静轩烈士生平。”孙良惠继承陶静轩的遗志，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率领工人纠察队，勇克警察局，攻占制造局，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孙良惠当年战斗的制造局，现已是上海大型企业江南造船集团公司，浦东更是上海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孙良惠英雄本色永垂青史

孙良惠和顾正红、刘华、陶静轩等同志都是彪炳我区的著名工运领袖。但有关孙良惠史迹的介绍，长期以来只有一鳞半爪的资料，特别是最终的归宿传说不一，扑朔迷离。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区始有党史资料征集机构，为编纂普陀区组织史资料，几次远赴北京中央档案馆，终于查到中共沪西最早党组织的名称和党员名单。资料表明，1924年9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后，沪西开始有最早工人党的组织，即中共小沙渡小组，8名党员，（名单佚失），1925年初，建有中共沪西支部，32名党员，名单第一人便是孙良惠，是支部负责人（书记）。我们已将这份资料编入中共普陀区组织史资料之内。但由于史料的征集，尚处在渐进的征集过程中，难度较大，有关孙良惠的许多身世问题一时难以查清。1993年4月，决定将征集孙良惠资料列为区党史室的重点工程。我区党史工作者到上海市、区和南京档案馆、上海社科院、市公安局、市交运局、上棉一

厂、上棉二厂、国营二机、普陀路街道、普陀派出所以及上海和全国总工会等单位 and 部门，进行全方位的资料征集，寻访知情人，征集到许多可贵的资料，但由于没有查证到最后归宿问题，仍不能进入正在编纂的普陀区志。后来我们在静安公安分局一份案犯档案中，发现孙良惠在汉口牺牲的线索。并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协助下，远赴武汉，终于查到孙良惠是1930年10月上旬，在任湖北省总工会主席时，不幸被叛徒指捕而牺牲的资料。这时，《普陀区志》已进入终审待排版印刷了。区志办领导听取我们最新调查结果后，当即决定将孙良惠烈士条目插入区志，终于实现在普陀区弘扬孙良惠光辉事迹的心愿。1997年，上海市总工会编纂的《上海工运志》也是听取我们的调查结果，增补孙良惠烈士条目入编《上海工运志》。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共上海党史大典》，均有孙良惠条目。本室为更好地编辑我区党史资料系列丛书第一辑《孙良惠》，于2000年11月再次派员赴武汉查证，并在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积极配合下，又进一步搜集到有关孙良惠的资料。

经过本室的努力，使长期被淹没的我区工运史上的叱咤风云人物孙良惠，终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再次显现了他当年在我区工人运动中璀璨人生的风采，让我区人民再次获得了一份丰富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

精神财富。



附录

《警务日报》有关孙良惠活动足迹的记载摘选

按：《警务日报》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视记录革命志士活动的英文档案资料。从1925年2月至9月及1926年7月20日至11月22日均有监视孙良惠活动的记载，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

《警务日报》敌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立场，在记载中用了不少诬蔑和诽谤之词，有的地方还歪曲事实。为保持档案文件的原貌，我们均照原文，未作任何改动，对此，务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1925年2月14日

普渡路区和戈登路区的内外棉所属各厂均已关闭。尽管如此，厂方对来厂上工的工人都已录下姓名，发给他们百分之三十工资。二月十三日，各厂的八千五百十八名日班工人中的三千三百七十六人和六千八百五十三名夜班工人中的三千一百一十一人曾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干活，厂方对这些工人发给了此类津贴。目前各厂附近依然一片寂静，但罢工煽动分子继续在大多数工人居住的苏州河北岸华界地区进行活动。沪西工会除了组织工人持旗游行示威外，还在闸北各个地点设置十人一组的纠察。他们检查来往工人，凡是内外棉各厂工人的工折，一律撕

毁，或强迫他们回家。纠察人员拿的旗子上写着“内外棉纱厂工人联合会”等字样。

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内外棉各纱厂的大约六百名罢工工人，在闸北大丰纱厂附近的三德里一号沪西工友俱乐部开会，由著名国民党煽动分子李成（即李立三）主持。李号召全体工人共同合作，将罢工坚持到日本资本家被迫承认他们的要求为止，接着他宣布要求如下：

一、不许日本人殴打中国人；

二、增加工资百分之十；

三、八厂开除的工人均应复职，目前被拘留的罢工工人应立即释放；

四、工人工资每两周发放一次；

五、随时退还被拖欠的工资；

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七、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接着，会议决定各厂推选首席代表一人，以便管理罢工工人。出席会议的有：孙良惠，他是一九二二年邮电工人罢工发起人李启汉的杰出同事；上海大学杨之华、王一知等三名女学生；全国学生总会著名成员刘清扬。会议于下午四时结束。有消息说，另二次会议将于二月十三日分别在南洋大学和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大学预科部召开，但经查证不确。

2月15日

二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大约有八百名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在闸北大丰纱厂附近举行露天集会，由闸北市民协会的重要成员顾秀担任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讲的有：著名国民党煽动分子李成，金银工人互助会会员孙良惠等人，他们都号召罢工工人把罢工坚持到底。会议随即作出以下决定：

一、推选孙良惠为罢工领导人；

二、为了向公众宣传罢工工人的苦难遭遇和争取各团体的支持，决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二时在西门勤业女子中学开会。

2月20日

二月十九日，除了在引翔港逮捕的那些暴徒以外，在普渡路捕房对面的闸北地区也逮捕了一个叫孙良惠的华人，并立即移送城里警察厅，该厅将把他移送租界当局。按孙系罢工领袖，现为会审公廨所通缉。同日，另有一个叫盛逸生的，因胁迫工人罢工于上午十时十五分在东京路被捕。此人是戈登路一八一号同兴纱厂工人，住澳门路六号，在他身上搜出的文件表明，他是罢工领导人。第三个叫赵小富子，也于二月十九日在澳门路内外棉纱厂附近被捕，几天前捕房早知他是罢工领导人之一，且持有会审公廨发的逮捕状。这些人犯将和在杨树浦区被捕人犯

一样，在适当时候由日籍会审员会审。

2月28日

尽管工部局捕房再三要求中国当局将在闸北捕获的罢工煽动分子孙良惠移交公共租界，但该犯至今未被引渡。按孙是中国当局应工部局捕房之请予以逮捕的。二月二十七日，工部局捕房一捕头带了通常所用的引渡证再次往访警察厅，但他们对他说，有关处理该犯的公函已于三日前发往南京，现本埠当局正等待指示。眼下一批因与工潮有牵连而被捕的人员业已释放，孙良惠是唯一被拘留的人。警察厅答应，一俟对他的案子作出决定后，当即通知租界当局。

3月9日

日商纱厂工人代表刘贯之和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代表潘冬林、常玉清于三月七日下午七时半又去淞沪警察厅，再次向该厅厅长呼吁迅速释放三名被拘罢工煽动分子。会晤结果，在当晚十时，一个叫邓忠的犯人获释，但另二名犯人戴三和孙良惠仍然被拘。

3月14日

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时，沪西工会会员刘华同另外四个人在闸北三德里四十号开会。刘在会上指出，日华纱厂

还未答复他三月十二日的信。会议决定再发一信。正在这时，大约有二十人前去该处，其中四人是纱厂工人，他们是：杨志庆(Yang Tsz Ching)、李金生、罗俊卿和姜文宣。他们问刘华，为什么被闸北警察署拘留的孙良惠至今还未释放。刘华当即将此事提请在座的进行讨论。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派十名代表去华商会要求释放孙良惠。代表们上午十一时出发，中午返回，他们从商会带来消息说，孙将于三月十四日星期六获释。

3月19日

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已任命以下职员：

秘 书：刘华，共党分子

会 计：孙良惠，最近释放的罢工领袖。

社会福利：刘贯之。

助理秘书：郭尘侠，内外棉九厂工头。

组 织：杨志庆，同兴纱厂工人。

李剑如，内外棉纱厂工人。

陶静轩，内外棉纱厂工人。

3月21日

工部局捕房于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日期间曾再三要求闸北当局引渡孙良惠，但均被拒绝，理由是该案尚未全面调查。按孙系因胁迫纱厂工人由闸北当局应工部局

捕房之请予以逮捕的。但是，闸北当局于三月二十日声称，他们应华商总会和日商纱厂厂主之请，并奉淞沪警察厅长之命，已于三月十六日释放此人。但根据捕房在后来进行的调查，有关各方对此人的释放均一无所知。为此，捕房将申请逮捕状，以便重新逮捕此人。

3月23日

大约有五十名男工和二十名女工于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开会，其中有劣迹昭彰的共党分子瞿秋白的老婆杨之华。会议由最近经中国警察当局准许交保释放的罢工领导人孙良惠主持。他在宣布开会后说，工友俱乐部现应首先考虑开办学校和医院的问题。近来外间谣传工友俱乐部正准备再次发动罢工，这不仅不确，相反，这个组织的发起人现打算将其全部精力贡献于建设性事业，要努力把工人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充分利用已经掌握的物力。散布重新发动罢工的谣言，其目的是要破坏工会的名誉，因此必须小心谨慎，不予理会。目前工友俱乐部除了进行谈判，使三月十八日被地方检察厅判处监禁二十五天的罢工领导人戴三获释以外，它与上次罢工风潮没有关系，而且还有意识地回避那些导致骚乱的论争。会议于下午六时结束。会上决定下次会议于三月二十九日举行。

4月2日

工友俱乐部秘书长刘贯之和那个未经审判而于最近获释的罢工领导人孙良惠于四月一日访问了克威先生，他们说内外棉各厂的被开除工人每人领到了八元赔偿金，但同兴纱厂和日华纱厂的工人却一无所得。克威先生答应去该两纱厂联系，务使问题得以解决。

4月6日

包括刘贯之、孙良惠和郭尘侠在内的大约男女各五十名日商纱厂工人，于四月五日上午十时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开会，由共产党分子刘华主持。刘说，吸收新会员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那个被中国警察当局不按常规释放的罢工领导人孙良惠在会上说，凡事应首先考虑工会今后的利益，否则不予办理。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同兴纱厂和日华纱厂工人。据估计，这两家纱厂，大约已有五千名工人被筹备中的工会吸收为会员。

4月15日

大约有四百名本埠各棉纺厂的童工于四月十四日下午六时十分在闸北工友俱乐部集会，会议由俱乐部会计孙良惠主持。孙报告说，工部局已提出一套保护童工的法规，但他怀疑纱厂主是否会按此办理。接着，俱乐部秘书刘华解释说，根据新的法规：

- 一、任何纱厂不得雇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
- 二、童工每日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
- 三、十六岁以下的童工不做夜工；
- 四、给所有童工发足工资；
- 五、准许童工每日学习二小时以增长他们的知识。

刘华继续说，每逢星期日俱乐部举办演讲会，他希望所有童工都来听讲。

4月20日

大约有五百名日商纱厂工人(其中一半是女工)于四月十九日上午九时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开会，由同兴纱厂工头袁仲英(Yuan Zoong Ying)主持。他说沪西工会发起人须继续努力把工会组织好。接着他要求听众们选举前往广州参加五月一日举行的劳动大会的代表。工友俱乐部秘书长刘贯之说，代表们应向劳动大会汇报上海工人所遭受的虐待和最近罢工事件的详细情况。

接着会议选举了下列人员：刘贯之代表同兴纱厂工人，陶静轩代表内外棉株式会社各纱厂工人，朱国平代表内外棉纱厂工人，孔燕南代表日华纱厂工人，孙良惠代表工友俱乐部。

5月16日

四月底去广州参加五月劳动大会的六名上海纱厂工

人代表也于五月十五日返回上海。

5月20日

大约有七百名内外棉纱厂工人(其中多数是十二厂工人)于五月十九日上午九时去闸北潭子湾三德里沪西工会。当他们递交入会申请书时,刘华就向他们发了会员证。该证持有人在罢工期间有权向沪西工会领取救济金。凡去过沪西工会的工人都拿到一张通知,上说顾正红追悼会将于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在潭子湾举行。下午一时,大约有一千人在上述工会外面集会,青岛工会两代表唐某和刘某向他们发表演讲说,罢工工人对外地的援助尽可以放心,因为全国各地团体都同情你们,并答应提供支援。下一个演讲人是浦东的一个姓杨的学生,他自称代表上海学生,他说他将向教育机关呼吁捐款和其他援助。著名煽动分子孙良惠(工部局仍对他持有逮捕状)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如果日本人立刻同意八项要求,那算他们聪明,否则,其后果将极为严重。他宣称,上海自来水公司和工部局电气处的工人均已答应提供支援,如果日本人仍然无动于衷,则他们将采取措施停止向外人供应水电。他劝罢工工人放心,因为胜利是有把握的。此集会于下午五时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性号召,我建议由中国当局采取行动。][中国当局已拒绝协助拘捕此人。](此系工

部局警务处总巡麦高云的批注。)

5月22日

大约有三十名正在罢工的日商纱厂工头，于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在闸北潭子湾炳江茶楼开会，由臭名昭著的煽动分子孙良惠主持。孙说，全体工头均应和工人们站在一边，不要为了日本人而背叛本国和本阶级的同志们。孙在结束其夸夸其谈的长篇演讲时要求工人们参加将于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为顾正红举行的追悼会。会议于晚上九时结束。

5月23日

五月二十二日晚十时，大约有一百名罢工工人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开会，由煽动分子孙良惠主持。孙宣布，有几名被捕房逮捕的工人将于五月二十三日受审，现已准备派下列人员去会审公廨旁听：刘贯之、陶静轩、孙杰三、关明轩和季子善。孙在会议结束时表示希望所有在座的都参加五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为顾正红举行的追悼会。

5月25日

在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下，罢工工人顾正红的追悼会于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在闸北潭子湾俱乐部附近的一块旷

地上举行。按顾正红是在五月十五日被内外棉纱厂的日籍工头为了自卫而向罢工人群开枪时打伤致死的。大约有五千人参加了追悼会，其中有一百名学生和几个妇女。淞沪警察厅的十二名警员和几名宪兵也在场，他们均全副武装。但由于追悼会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因此警方无机会进行干预。追悼会会场布置有大约三百面不同的旗子和轴幛，另有六种不同内容的传单向手拿死者照片的到会群众散发，这些传单谴责了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下面是轴幛上的典型词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抵制日货”，“不许日本人在中国开设纱厂其他工厂”，“他是一位模范的革命家”，“他是工人运动的先驱”，“全体工人联合起来，杀人者应予严惩”。追悼会于下午二时五十分宣布开始，这时参加会议的乐队演奏了几支选曲。接着，人们在主持会议的煽动分子孙良惠的带领下，向安放在草棚内一只讲台上的死者照片致敬，然后由臭名昭著的共党煽动分子恽代英（此人现是上海大学教师）向群众发表演讲。恽说，他是和听众们一起来追悼被日本人卑鄙杀害的一名中国工人的。中国的腐败官吏是日本人收买的走狗，他们不仅不将罪犯提交司法审判，反而派遣警察监视受害人的伙伴。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采取措施务使杀人犯缉拿归案。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应团结起来把日本人统统赶出中国。在追悼会上以类似语气同时在五个讲台上发表演讲的学生和工人领导人中有：臭名昭

著的共党分子瞿秋白老婆杨之华；杨树浦工会代表张佐臣；大夏大学学生高伯定、刘峻山；以及自称是孙逸仙博士的信徒俞达。每个讲台上的演讲结束时，群众就齐声高呼“反对日本”，“报仇雪耻”，“为了斗争，工人们联合起来，把自己的队伍紧密团结起来”，追悼会于下午四时结束。

5月27日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大约有五十名男工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开会，由俱乐部助理秘书刘华主持。刘说，刘贯之为了工人的利益作了努力，但结果现在自己进了监狱，须交保一百元方能重获自由。煽动分子孙良惠说，刘当然应该保释，但同样也应营救其他人。接着孙良惠建议，最好现在不要有所行动，以待五月三十日星期六审理此案时再说。所有与会者均同意孙的建议。会议于上午十时结束。

5月30日

五月二十九日，淞沪警察厅派一名便衣警察去潭子湾监视臭名昭著的煽动分子孙良惠。

6月1日

五月三十日下午五时，大约有一百名男工和同样人

数的女工在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开会，由煽动分子孙良惠主持。孙报告说，有若干学生因同情罢工工人在租界发表露天演讲，但被工部局捕房打死或打伤。他这些话激起了与会者的愤慨，他们叫喊要立即向英国人和日本人报仇。会议最后决定派代表去本埠各团体联系要求给予援助，旋即于晚上八时结束。

6月9日

为了安排工人复工，溥益纱厂厂方于六月八日下午二时派代表去沪西工会，并会见了著名煽动分子孙良惠。孙答复他们说，溥益是华商纱厂，只要厂方发放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他将准许工人于六月九日复工。该厂代表当即离去。

6月19日

闸北潭子湾工友俱乐部原创始人孙良惠、刘贯之、郭尘侠和古月三等人现均在宝山路宝山里二号上海总工会工作。工友俱乐部目前由秘书刘华负责。

6月22日

下面是当前罢工运动中的几名最著名最活跃的华人领袖：

林 钧 浦东人，上海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成

员。曾多次担任重要群众大会主席,其中包括五月三十一日在华商会举行的决定总罢工的那次集会。

刘一清 安徽人,上海大学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成员。曾担任六月二十日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主席,当时大会决定工人继续罢工和抵制日货、英货。共和路奉军司令部张学良将军曾数次接见此人。

李立三 闸北宝山路二号总工会委员长。该工会曾收受大笔捐款,又向罢工工人发款用以延长罢工。此人亦是闸北潭子湾三德里沪西工会组织人之一。

刘 华 潭子湾三德里沪西工会的组织人。按沪西工会是负责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事宜的。据报道,此人亦和上海大学有联系。

刘贯之 闸北三德里沪西工会秘书长。此人最近由于散发传单被捕房逮捕,后保释,但审讯时未出庭。在上述沪西工会所举行的多次会议中,此人是个重要人物。

孙良惠 著名共党煽动分子。工部局警务处就有关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事件正在通缉此人。

最重要的组织是:

名 称	地 址
上海学生联合会	南市沪军营亚东医科大学内
上海总工会	闸北宝山路二号
工商学联合会	西门外黄家阙路二十六号
沪西工会	闸北潭子湾三德里三十七号至四十号

如将上述六名煽动分子以及那些协助支持他们的人拘捕起来，并迅速加以处理，同时查封与他们有关的那四个组织，则目前的运动不久即可结束。

6月30日

自六月二十九日起，位于闸北潭子湾的工友俱乐部将改名为“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

7月13日

昨天下午三时，闸北三德里工会召开会议讨论上述事件，刘华缺席，表面上说是病了，但实质上是因为害怕。当时有十三人推选孙良惠主持会议，会上决定释放拘押在三德里三十七号至四十号和大丰里三十三号的大约十名“俘虏”。此项决议已于下午五时执行。

7月15日

孙良惠于七月十四日下午七时致函共和路奉军司令部，请求该部准许他们在潭子湾召开会议，以讨论复工条件。

7月16日

劳勃生路三十号华商崇信纱厂的男女工人各约一百名于七月十五日下午一时在潭子湾总工会办事处开会，

由会审公廨通缉的工人煽动分子孙良惠主持。孙报告说，如果上述纱厂工人同意复工，则该厂愿作如下让步：

- 一、承认工会有代有工人之权；
- 二、无充分理由不开除任何工人；
- 三、工人罢工期间发一半工资；
- 四、不再虐待工人；
- 五、停止雇用外国人来厂协助管理工作；
- 六、给被开除工人发放全部应得工资。

孙良惠又说，该厂厂方愿作上述让步，他希望工人能于七月十六日复工。会议于下午三时结束。

7月18日

共和路奉军司令部的八名士兵七月十六日晚九时去总工会潭子湾办事处，此行旨在逮捕会审公廨所通缉的工人煽动分子孙良惠，但未成功。七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和下午六时这队士兵又两次去该处，但仍未果。由于掀起了反对孙良惠的一片叫喊声，现总工会潭子湾办事处已由另一工人领袖吴明轩负责。

昨天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约有七十名士兵在闸北三德里工会附近值勤。

昨天下午二时左右，一个自称姓金的去闸北三德里要见刘华、孙良惠和刘贯之。工会会员怀疑他是密探，把他扣留到下午四时。当时此事引起了奉军士兵的注意，后

来士兵将他带往闸北奉军司令部。

7月22日

昨天上午八时，内外棉的一百三十七名工人在闸北潭子湾每人领取三元钱。潭子湾昨天没有开会。孙良惠这几天没有露面。有几名成员在答复他人询问时解释道，孙已离埠去募捐了。

7月25日

共和路奉军司令部的八名士兵每天从上午十时至晚上十时继续监视潭子湾总工会办事处。尽管这般监视着，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时仍有五十名左右工人煽动分子在潭子湾三德里北面大丰里三十七号楼上房间里举行秘密会议。上海总工会宣传部部长郭尘侠主持会议，他报告说，邢士廉封了好几个组织。又继续说，邢的态度毫无理由。二十万左右工人为了民族的尊严参加了罢工，在七个星期的罢工期间，模范地表现了自己。因此邢一定是接受了外国人的贿赂才决定军事干涉的。目前是运动的紧要关头，大家一定要警惕，行动要极度谨慎，要作种种努力迫使邢司令改变政策。有鉴于此，已派孙良惠去广州，另有工商学联合会的五个委员被派往北京。倘若政府官员试图查封总工会，全体罢工工人就去司令部要生活费。一个女工孔燕南赞同这些意见，并且说，作为最后一着，罢

工工人只得诉诸于暗杀。经举手表决，与会者通过这项建议。集会在下午五时解散。

8月14日

下面是一份最新的实际参与推动罢工运动的团体名单，以及他们的详细地址和主要成员姓名：

上海总工会 闸北共和路和兴里 27 号

主要成员：李成 朱义权 刘钟鸣 刘少奇 孙良惠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 闸北宝通路顺泰里 30 号

主要成员：林育南 孙良惠 孙元明

（注：此团体名单原有 36 个，这里只选登涉及孙良惠的 2 个，其他均省略。）

1926年7月20日

1 名著名劳工煽动分子叫孙良惠的担任了闸北潭子湾上海总工会第四分会负责人，已从广州回到上海。昨又在“大世界”受到 100 多名工人和学生的欢迎。他向大家报告了有关广州工人的胜利和广州市民政府的情况。

1926年11月22日

孙良惠于 10 月 10 日由汉口返沪，近来又与前内外棉纱厂工人范开源离沪赴汉，在沪期间住在浦东码头工联。

后 记

《孙良惠》系由中共普陀区委党史研究室重点编研课题的成果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编纂《中共上海市普陀区组织史资料》时,便发现孙良惠是我区的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但是,有关孙良惠的革命活动史料却长期被历史尘埃所淹没,以至查遍中国所有已出版的人物传略,没有孙良惠的任何传记。遂此,区委党史研究室决定将征集、编纂孙良惠资料列为重点课题。近10年内,研究室同志走南闯北,到中央、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档案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图书馆、全国总工会、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龙华烈士陵园、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纺织局、上海交通运输局等单位查阅档案资料;到孙良惠当年生活、战斗的同兴纱厂、同兴工房(现今普陀区江宁路及澳门路524弄一带)所在地段的里弄、派出所、孙良惠原籍南京等地调查,终于显现了孙良惠的璀璨一生,撰写了读来十分感人的《孙良惠》,并先后摘要编入《上海市普陀区志》、《上海工运志》、《中共上海党史大典》、《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等大型辞书,沉寂多年的孙良惠烈士事迹资料终于在中共党史上得到存史、弘扬。

本书还收录了许多有关孙良惠革命活动的文献资料,供读者学习、研究参考。

本书的出版,得到许多单位的支持,吸取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李婉霞、唐丽娟同志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深切谢意。本书是在区委党史研究室领导下,集体科研的成果,执笔为华校生、刘景成,最后审稿徐林。

鉴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对书中的不当之处,请读者鉴谅、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12月

